今阅·图书

直面中国人口危局，发出时代最强呼声！
不能不读的人口学经典！

易富贤◎著

大国空巢



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茅于轼** / 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梁中堂**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孔庆东** /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原全国政协委员 **叶廷芳**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姜明安**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董克用** /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孙笑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学部委员 **余永定** /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 **苏剑** / 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潘维**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郑也夫**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教师 **杨支柱**

鼎力推荐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国空巢>

第一章 第一节、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政治、经济、国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赖于人口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要生2个孩子就可以了。但是由于部分小孩会在生育之前夭折，并且正常的出生男女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106，因此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为2.1，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TFR）是人口学的一个重要指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可以近似理解成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

总和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通常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期）。

世代更替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育龄期死亡率、出生性别比等。古代由于夭折率高、寿命短，要保证

人口的世代更替，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6个左右孩子。由于死亡率的降低，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就可以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5到3.3个孩子。[EspenshadeTJ,GuzmanJC,andWestoffCF,”Thesurprisingglobalvariationinreplacementfertility”,PopulationResearchandPolicyReview,2003,22:575-583.]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2005-2010年发达国家婴儿死亡率平均为6.4‰，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0.2‰，中国则为22‰；中国5岁以下女童死亡率高达31‰，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7‰。中国的青少年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也高于发达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远比发达国家（在正常的102～106范围）要高。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111、120、119。

考虑到中国的畸形性别比以及育龄前和育龄期死亡率，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左右，而不是2.1。

由于有不孕不育（中国目前超过1/8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单身、丁克（双收入，无孩子）等人群的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

个孩子，部分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要是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生、养不起三个孩子，就表明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样是可更新资源，必须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当于掠夺性利用人口资源。但是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33，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了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左右，其中2010年只有1.18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2104页。]长期的低生育率严重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防、民族心理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

中国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3亿，只花了两百多年时间；同样，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口比上一代差不多减半），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

第一章 第二节、古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

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同样也不会让人口无限地增长。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注意到古代风水学家观察到的这样一种现象：财丁不能两旺。换句话说，越穷越生，越生越富，越富越不生，

越不生人口越少，被其他人群取代。在中国，总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生育率高于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世界范围，也是富裕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这导致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和穆斯林地区等，都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力不足，不得不引进大量外部移民，这些来自生活水平较低地区的移民，慢慢地取代、占据了本土人原有的优势地位。[海克：《人口的假话》，《新闻周刊》2002年28期。]

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通过这一升一降的方式，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文明的兴衰更替。在古代通过“左手”调控人口：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现代通过“右手”调控人口：避孕、高养育成本、低生育意愿、高不孕率等。

在远古时代，生产力落后，粮食来源有限，生存条件恶劣，寿命短，人类繁衍非常缓慢。无数部落相继灭绝（全世界很多地方发现了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有些还曾经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些部落在艰难繁衍数百万年后都先后灭绝），整个人类也曾几度到了灭绝的边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有所积累，开始出现人类文明。婚姻制度的建立规范了性和生育秩序，确立了男人对孩子的“产权”，更是激发了男性养育后代的动力。“孝”文化的确立，使得养育子女能有所回报，给人口发展之火浇上利润之油。

但是即便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也只有二十岁左右，“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疾病（如痢疾、普通感染）在当时都可以致命，现在只需要简单手术的骨折在当时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彻底丧失。康熙皇帝共有21个王妃，共生育55个子女，只有31个子女活到成年。乾隆皇帝共有17位王妃，生有17子10女，但是有5个皇子、5个皇女早殇。顺治共有8个儿子，将康熙选为继承人是因为康熙出过天花，已经有抵抗力。沙皇俄国彼得大帝的两位妻子共生育10个子女，但是只有一子二女活到成年，唯一的孙子彼得二世14岁死于天花。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孩子的存活率更低，有时候生育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长大成人。

一场瘟疫、战乱足以毁灭繁衍了上千年的家族，比如1618年至1648年的欧洲30年战争加上黑死病,欧洲人口减少一半。1492年的时候美洲有五六千万印第安人，但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由于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天花等传染病，人口减少90%。

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因为战争和瘟疫导致人口损失高达60%以上，人口多次从四五千万下降到一千多万。春秋战国时期人口约为两千万，公元2年增加到5900多万，东汉和三国的战乱引起人口锐减，到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年间）恢复到1600多万。后面又出现五胡乱华，人口锐减。经过隋唐盛世，到公元755年人口恢复到5200多万。但是经过安史之乱，到公元760年（唐肃宗年间）人口再次减少到1600多万。宋朝人口有所恢复，但宋元战争又导致人口锐减，公元1403年（明成祖时期）人口达到6600多万。[《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明朝末年的瘟疫和明末清初战乱又导致人口锐减。

由于人口繁衍的艰难，古代很多非常辉煌的文明都因为人口不能延续导致文明的中断。中国以前至少有数万个姓氏，但绝大多数的姓氏和无数民族都已经陆续灭绝，现在幸存的家族在历史上也都几度到了“子姓几尽，不绝若线”的险境。

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公元1年全球人口只有2.258亿，其中中国人口5960万（占全球）；到公元1000年全球人口增加到2.672亿，到1500年也只增加到4.34亿。稀少的人口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科技进步非常缓慢，生活质量也没有大的变化。以1990年的国际元（Geary-Khamisdollar）为基准，公元1年、1000年、1500年全球人均GDP分别只有467美元、453亿美元、566亿美元。[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8AD”,]

第一章 第三节、近代人口爆炸（1）

1500年之后世界人口才开始快速增长，从1500年的4.4亿增加到1600年的5.6亿、1700年的6.0亿、1820年的10.4亿、1900年的15.6亿，然后在1927年达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达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突破70亿。

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人口爆炸？一是粮食增长，二是寿命延长。

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经过数千年培育成功的高产作物推广到全球，传入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马铃薯、红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等近30种。[王思明：《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马铃薯、玉米、红薯的单产比欧亚大陆传统的小麦、水稻、大麦、燕麦、高粱要高出许多倍，红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这些作物“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向高山、大箐、丘陵、河滩进军，大地被充分利用起来支持人类的繁殖。这些作物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玉米、马铃薯现在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四大粮食作物。马铃薯的出现弥补了谷物收成不足所带来的粮食短缺。16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将其带到欧洲。17世纪时，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当时的欧洲，一亩马铃薯田和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刘作奎：《改变世界的四种植物曾导致人类大迁徙》，人民网（来源：《环球时报》），2006年08月31日，]爱尔兰1500年、1600年人口分别只有80万、100万，但是自从马铃薯引入后，爱尔兰人口迅速增加到1700年的193万，1820年的710万，1850年850万。1845年至1847年，一场突发的植物枯萎病横扫爱尔兰，马铃薯大减产，短短两年内，就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及其引发的疾病，导致上百万爱尔兰人移居英格兰、北美或澳大利亚。据估计，在1845年-1925年间，约有5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1990年美国爱尔兰裔人口有3874万，爱尔兰-苏格兰混血人口有562万；

[,“Ancestry:2000,Census2000Brief,”IssuedJune2004,,]美国多位总统（如杰克逊，麦金莱，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克林顿）是爱尔兰裔。根据加拿大人口统计资料，[“Ethnicorigins,2006counts,forCanada,provincesandterritories-20%sampledata,”StatisticsCanada,DateModified:2010-10-06,#Notes]2006年加拿大爱尔兰裔人口有435万。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数百万爱尔兰裔人口。2010年爱尔兰本土还有448万人口。就是说，1600年100万爱尔兰人现在有四五千万后裔！

除了美洲作物外，化肥的合成和推广也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氮、磷、钾是“肥料三要素”。1838年，英国乡绅劳斯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制成磷肥，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化学肥料。184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出版了《化学在农业及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创立了植物矿物质营养学说和归还学说，为化肥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李比希还在1850年发明了钾肥。[《化肥（Chemicalfertilizer）》，新华网（来源：中国科技馆），2008年03月30日，]

第一章 第三节、近代人口爆炸（2）

与来自土壤、可循环使用的磷、钾不同，氮主要靠雷电从空气中合成、随雨水补充给土壤（并最终回归空气），部分靠豆科作物根瘤菌固氮。在20世纪之前，农作物所需要的氮肥来源十分有限。当时农业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来自有机物的副产品，比如人畜粪便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数量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而空气中氮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当年德国人口增长很快，所瓜分的殖民地很少，粮食必须自给自足，德国的化学家提出向空气要氮肥的设想。1911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厂，开创了人类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李力钢，刘博：《20世纪的科学技术》，北京：新时代出版社，2011年。]

20世纪农业科技（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更是突飞猛进。谷物世界平均亩产从1961年的95公斤（此前更低）提高到2009年的234公斤（同年我国约363公斤，荷兰、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超过600公斤）。[“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

近代人口爆炸很大程度还应该归功于人类成功地扼住了控制人口的“左手”。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黑死病、天花、伤寒、痢疾、斑症伤寒等被有效控制，粮食增加后体质也增强，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灭和青霉素的发明。

天花因其流行迅猛和极高的致死率（一般可达25%，有时甚至可高达40%~50%）而被称为“死神帮凶”。患者即使不死，脸上和身上亦会留下永久性麻点疤痕，甚至失明。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到1801年，接种牛痘的技术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开来，并在十九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天花接种使人类的平均寿命从20岁左右飞跃性地提高到40岁。

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1942年起，美国制药企业开始大批量生产青霉素。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问世挽救了无数被细菌感染的病患，人类平均寿命从40岁延长到60岁。加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进步，2010年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69岁（发达国家为78岁）。

外来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经降低，现在寿命的延长更大程度取决于人的本身，如果癌症和心脑血管等决定寿命的关键疾病能被攻克，那么人类的平均寿命还能有所延长。但考虑到细胞分裂规律，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慢慢逼近人类的长寿极限。联合国预测2100年全世界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将延长到81岁。如果医疗服务过度偏重于延年益寿，那么必将与用于迅速恢复劳动能力的医疗服务发生矛盾，也将降低养幼的能力（导致生育率下降），加重老年化危机。

第一章 第四节、美洲作物对中国清朝人

根据官方资料，明朝时期中国人口曾经超过6600万。但是明末大旱，粮食减产。饥荒、瘟疫（如鼠疫），农民起义（如张献忠、李自成起义）不断，加上明清战争，人口锐减。[周同：《被瘟疫灭亡的明朝》，《健康大视野》2005年第1期。]

清朝初年人口恢复性增长。清朝统治者非常注重人口繁衍，提出“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康熙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还亲自培育出了早熟新稻种，在南

方推广连作双季稻，并把水稻的种植推进到了长城以北。[闻性真:《康熙和他的御稻种》，《历史学家茶座（第六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根据《清圣祖实录》卷43记载，康熙帝还曾下令严禁抛弃婴儿，“凡民间贫不能养，弃所生子，或乳母主人子而弃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长育。其弃而不养者，严禁。”

康熙投巨资治理黄、淮水患，疏通兼治运河，历30年，收到巨大成效，农业连年丰收。清王朝还采取了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轻捐薄赋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清康熙51年（公元1712年）规定，依照上年各地所报了数，固定税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逐步实行“摊丁入地”，丁银和地赋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取消了全部人头税，添丁不加银，大大促进了人口发展。

可能由于气候等原因，欧洲人口增加主要归功于马铃薯，而中国却是产量更高的玉米、红薯（目前中国红薯产量还占世界总产量的80%）。

玉米早在明朝嘉靖年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只有几十年时间）就传入广西等地，到清朝康熙中期传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所以取名“蜀黍”，后来在全国推广。

红薯是在1593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明朝末年红薯推广技术就已经成熟，但是主要种植地还只限于福建等少数地方。

清朝政局稳定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广这些高产作物。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吃红薯，还亲自下诏推广红薯。红薯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黄启臣：《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

农业技术大为提高，复种指数也大为提高，出版了大量农业书籍。耕地面积也持续增加。依照汪士铎1851年的说法：“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汪士铎撰，邓之诚辑录，《汪悔翁乙丙日记》，北平：文芸阁，1936年。]

而且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孙三代主政长达134年，社会安定，政策连续,也起到了持续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

从当时欧洲情况来看，由于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对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区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悬殊（法国人口增长就很缓慢，而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增长较快）。中国当时的以“孝”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为顽强的。

中国人传统以植物粮食为主的饮食习惯也有助于极大限度地养活人口（粮食转变为肉类、奶制品会消耗谷物）。这点从印度也可以看出，印度目前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由于有近一半人是素食者，粮食能够自给。

康熙、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非常快速，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由于康熙和乾隆时期人口统计计标准不同，乾隆的估算并非十分严谨。笔者考证1792年的人口（超过3亿）应是康熙元年（1662年）的人口（4475万）的6.9倍。[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01期。]

人口增长，伴随的是综合国力的提高。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的估算，1820年的时候，中国人口（3.8亿）占世界（10.4亿）的，GDP占世界的（西方国家占）。[AngusMaddison,"TheWestandtheRestintheWorldEconomy:1000–2030,"WorldEconomics,vol.9,(October-December2008),]

第一章 第五节、人口增长推动经济增长

在近代人口增长的过程中，英国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级

数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过饥寒交迫的生活。

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据世界银行统计，自1800年以来的200年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食品价格事实上下降了高达90%，这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也能吃饱肚子。[梁紫星：《被夸大了的环境危机》，《科普杂志》2004年第3期。]

人类生活水平尤其在最近100年得到了质的提高。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多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吴万伟：《从“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国网，2006年5月15日，(译自“DoomandDemography”byNicholasEberstadt.).]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世界人均GDP从467美元（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标准）到666美元，花了1820年才增加了43%，而从1820年到2008年的短短18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10倍，从666美元上升到7614美元（同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多）。[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8AD”,]

其实在马尔萨斯之前，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1723～1790）就已经认识到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他认为“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制于这种力量的规模，或者换句话说，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经验统计学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库兹涅茨强调人口增长可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这一结果必然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根据大量史实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依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等于技术进步率，总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加人口增长率，国家的总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认为“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第一章 第六节、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近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是科技爆炸。在谈论历史时，人们往往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价历史人物。[MichaelH.Hart,The100:ARankingoftheMostInfluentialPersonsinHistory,Chicago:CitadelPress,2000.

]哈特说：“虽然政治变迁是重要的，但公正地说，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500年之后，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同他们生活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500年时祖先们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两样。……但科学发现不仅

带来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命，它还完全改变了政治和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因而，在他的排行榜上，科学家和发明家最多(36人)。

在哈特的名单中，纸的发明人蔡伦（？～121年）高居第7，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发明人约翰·谷登堡（1400～1468年）高居第8，哈特解释说：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希腊、罗马文明）先进，缺乏适当的书写材料（只有笨重的竹简）是中国文化进步的一种极大的障碍，而西方有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虽然有其缺陷，但是却比竹简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蔡伦对纸的发明，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在公元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成就超过了西方。西方国家开始使用纸以后，就堪与中国平起平坐。在15世纪，约翰·谷登堡发明了一种可以大规模印刷书的技术之后（虽然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并未推广），西方文明再次超过了中国。

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的时候，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早期。谷腾堡的印刷术印刷速度快，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就已经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各种书籍，大大加速和深化了文艺复兴，还对后面的新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

但是光是印刷术还不足以完成文艺复兴和引发工业革命。美洲高产作物的推广，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有足够的人口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科学、哲学和艺术研究。比如牛顿（1642～1727年）在21到27岁期间为现代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牛顿时代，美洲高产作物已

经在英国普及，牛顿不务农已经不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才有机会继续学习、研究。否则，像他这样父亲早逝的农民的孩子，十几岁必须承担其家庭重担，一代科学巨星就将埋没于农田。

以1492年为界，此前5000年的累计人口总数不到此后500年的一半。而现在的文明又是继承了人类所有人口累计创造的文明。古代寿命短，平均每人创造文明的时间很短；生产力低下，从事科研的人数与现在相比微乎其微；由于人口稀少，传播速度也慢，科技人员之间也难以形成协作关系；人口稀少，科技成果也难以产业化，也就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要是每10亿人出一个牛顿式的人，现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几个，古代需要10代人才出一个（并且寿命短，还没到创造成果的时候可能就去世了）。在哈特的名人排行榜中，哥伦布之前的4000多年里只有34位名人，而哥伦布之后却有66人。现代绝大多数学科的创始人都诞生于哥伦布之后。

图1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

人口增加，对现有的资源只是“减法”地消耗；但更重要的却是使目前的“非资源”（如太阳光）变为新的资源（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比如瓦特的蒸汽机使得“非资源”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启动了工业革命；奥托的内燃机使得“非资源”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哈伯的理论使得“非资源”空气变为氮肥(用空气制造面包)。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光明。能源的突破，“人工小气候”的应用，大大扩展了人类生存空间(古代人迹稀少的地方现在也建成了大城市)。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变为“资源”的过

程。只要科学技术在进步，自然资源永远也不会枯竭，人口减少意味着开源的智力减少。中国人口减少对全世界来说也是悲剧。

“人口爆炸”导致了“知识爆炸”和传播速度的加速，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需求的推动，计算机芯片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而价格却减半，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络也呈现了这种指数增长趋势。以太网的发明者鲍勃·梅特卡夫揭开了网络价值的秘密：“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向峰，朱贝校：《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大地》2000年第十八期，]这里“网络”的概念可以并不仅限于计算机网络。比如互联网上的用户越多，观点碰撞就越频繁，新的观点就越容易迸发，政府的决策也就可以更科学合理。互联网对世界的影响将远超过造纸和印刷术，将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以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第一章 第七节、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

人是高等动物，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很多社会学特性。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揭示了生物的社会属性。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生物科学，无疑将对社会学基础理论的重建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生物学的深层的哲学观将极大地改变我们的思想方法。”

细胞生长分为潜伏期、指数增生期、停滞期。细胞潜伏期与细胞密度密切相关，细胞太少的时候生长速度会很慢，甚至全部死亡，这是因为细胞生长需要一些细胞自身产生的辅因子，若细胞太少，会导致这类因子不足。细胞增加到一定数量，细胞间形成缝隙连接，允许细胞之间的电耦合（比如通过电耦合，心脏的所有心肌细胞可同步动作）和化学通信，细胞功能很活跃，进入指数增生期，每个细胞的“占地面积”也有所缩小。指数增生期持续3～5天后，空间渐趋减少，能抑制细胞的运动，这种现象称接触抑制。当细胞密度进一步增大，培养液中营养成分减少，代谢产物增多，则发生密度抑制，进入停滞期。继而培养液中营养渐趋耗尽，代谢产物积累、pH降低，细胞会中毒，重则死亡。将细胞消化下来，稀释后种植在新培养瓶，细胞又快速增长。但是如果传代过晚，因细胞已受损，传代后细胞也生长不好。也就是说，要让细胞保持完善的功能，需要较高的细胞密度，但又需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既有“社会性”，又有“独立性”。

人口和文明发展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当人口很少的时候，很难产生文明。有些边远地区的民族往往因为人口太少而文化落后，甚至人口灭绝。只有当有足够人口数量的时候，有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才能产生文明。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人均耕地减少、土地兼并、吏治腐败等，出现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假如不改善吏治、提高农业技术的话，会出现社会动荡、饥荒、瘟疫、甚至战争，人口很难再增加。战后人口又快速增长。新的技术（如农业技术、建筑技术）使得承载人口的空间增加，人口相对变稀了。

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人口越多，大家可以共用很多公共的东西，土地、基

础设施（水、电、道路、通讯）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公共服务越便利，人均公共投资反而越小，同时有利于环境污染的处理。[薛小和：《城市化道路怎么走？》，人民网（来源：经济日报），2000年05月19日，]

人口越多，微小的需求也能形成市场，刺激产业化，分工更细，智力资源越丰富，技术优势也就越容易发挥并被所有人分享，产业间会形成产业链，于是就业增加、消费增多。比如说在甲地8个人应聘1个职位，乙地80个人应聘10个职位，比例都一样。但对于求职者来说，在乙地多了10倍的应聘可能性；对于公司来说，甲地8个人可能没有1个合格的，公司只好空着职位，乙地因为有80个应聘者，公司就算不能招到10个合格的，也可以招到六七个合格员工，相对来说乙地就业率更高(对公司和个人都有利)，并且在乙地还可以增加1个服务行业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人都愿意往美国跑、小城市的人和企业都愿意往大城市跑的原因。

第一章 第七节、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

企业间相互竞争，迫使企业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使消费者和企业实现“双赢”。由于人口集中，经济主体间的交往多，资金流量大，也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便可大显身手。各大行业间的互动性，使城市的经济总量像滚雪球般地增长。[王东京：《看准城市规模效应》，中国城市化网站，2004-03-07，]

人口密度效应在交通运输上体现得最充分。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国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单位时间内，这个国家的人均单位货物长距离迁移的距离越短。人口稠密的日本人均铁路只是澳大利亚的1/10（人均建设成本也低），但日本铁路运输更便利，服务质量更好，并且发展起高速铁路。小城市由于人口少，公共汽车的班次少，乘一次车要等很长的时间；大城市人口多，几分钟一趟车。

娱乐产业也不例外。相同成本拍摄的电视、电影因为观众增加，赚的钱也多。赚的钱多，竞争也就激烈，结果是导演和演员的素质提高，可以花费更多的钱进行娱乐投资。老百姓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看高档次的表演。美国在电影业方面的垄断地位就与其人口数量很有关系。

旅游业也一样。一个旅游景点要是有大量的游客，就有资金进行景点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游客人均担负的费用就越低。要是游客太少，很多有潜力的旅游景点就无法开辟。

美国之所以是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原因之一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效益。现在中国和印度（可能还应包括巴西）在崛起，也是因为有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

城市化就是尽量利用人口优势。每个国家的都市圈大都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而我国两千多个县级城市只有不到20%达到了应有的规模。人口流动就是实力的流动，茅于轼注意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茅于轼：《大国空巢》序，易富贤：《大国空巢》，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随着人口大量迁往沿海和大城市，内地将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今后内地的地级市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更不用说县城了。现已出现民工荒，今后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发展内地经济?

当然，城市规模过度膨胀，也会带来额外的代价，如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其实目前这些"城市病"并非不可救药，也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这些负作用根本无法抵消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人类近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就是不断解决"城市病"的过程，城市也越来越大。比如从人力车、马车到汽车，再到轻轨、地铁，交通大为改观。从柴到煤炭，再到液化气和电，城市的环境承载力也提高了。

其实现代最严重的"城市病"不是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而是超低生育率。由于城市规划的不合理，城市容积率高，人均室内空间和户外空间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接触抑制和密度抑制，房价高，民生压力大，民不聊"生"，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地区生育率只有。

而美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与城市规划、合理的房价有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日本的二、三倍，中位房价只是人均GDP的5倍，户外空间也大，每个社区都有公园。即便芝加哥（生育率为1.9左右）这样高密度的大都市，人口密度也只有4000人/平方公里。而美国德州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3左右，与其住房宽敞而价廉也有关。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但由于严格限制城市土地供应，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这种高密度进行城市规划的，北京、上海超过1.5万人/平方公里，其实正在走日本、韩国、台湾那种民不聊“生”的城市化老路，光“利用人口”，不“生产人口”。目前上海、北京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了。

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提高，比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6.7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1.6平米；30平米房子的家庭在1978年能够养2个孩子，现在却不行了。美国1950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26.6平米，现在超过70平米了。中国现在城市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但是今后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住房面积和设计会与现在大不一样。中国城市今后将面临根本性的改建，但是今后老年化严重，劳动力成本将非常高，城市改建的成本将非常高（如日本和欧洲国家那样），那么今后中国也会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坑中。

因此，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应该重点建设中心城市，形成人口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增强辐射能力。而东部发达省市，应该借助

发达的交通，引导人口向郊区分流（伦敦人口在1939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降低城市的容积率，防止低生育率这一“城市病”，让城市既能生产物质财富，也能生产人口财富。

第一章 第八节、“人口灾难”的狼真来

世界人口自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出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人口悲观论甚嚣尘上，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的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

人口灾难“狼来了”喊了两百年，狼真的来了，不过来的不是“大灰狼”（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减少）。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生育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的资料，[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 发达国家平均生育率在7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2005-2010年只有1.66。如果稳定在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上，那么日本、欧洲人口将分别从2010年的1.27亿、7.4亿减少到2100年的0.57亿、4.8亿。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从60年代后期的6.0左右下降到2005-2010年的2.6。

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1、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关系错位。从个人到政府都强调物质再生产，而忽略人口再生产。

2、养老社会化。养孩子的投入与个人收益脱钩。“造物”有报酬，“造人”无回报（还影响“造物”，降低家庭收入）。“造人”的巨额投入主要是由家庭出，产出却主要在社会。从经济上，家庭养儿是亏本的。孩子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是个人的高消费。

3、养孩子成本增高。美国农业部2010年的研究表明，养小孩到18岁，平均需要花费$226,920，刚好相当于美国的中位房价（$221,800）。孩子越多，边际成本越低，养第2个孩子的成本是第1个孩子的60%，养第3个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个孩子的27%，但3个孩子对社会的回报却是一个孩子的3倍。[LauraVanderkam,“Heyparents,thethirdkid'sabargain,”USAToday,Updated1/10/2012,]中国只允许生1个孩子，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多生孩子而降低边际成本，养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报率却是全世界最低的。由于只有1个孩子，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只养到高中毕业（美国读大学大多靠孩子自己打工或贷款），还得承担大学教育、买房、结婚、生育等费用。可以说，中国是以3个孩子的成本只为将来培养了1个劳动力。现在大家觉得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养不起两个孩子，是根据独生子女的养育标准；如果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那么养育成本将大幅下降。

4、避孕率增加。在避孕套、避孕帽和子宫颈帽等发明之后，19世纪西方国家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口服避孕药和宫内避孕环研制成功后，更是推动了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5、结婚率降低，单身、丁克人群增加。比如2003年日本有54%的25岁以上女性、43%的30岁出头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多了一倍。预测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将是单身家庭，而首都东京地区的单身家庭比例将超过40%。[忻冬：《经济独立观念改变日本女"单身贵族"跟婚姻说拜拜》，新华网（来源：北京青年报），2004年09月02日，]香港的单身比例目前已经超过日本，北京、上海、广州正在追赶香港。

第一章 第八节、“人口灾难”的狼真来

6、离婚率升高。传统的婚姻模式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但是现在经济社会化，“经济合作社”被打破，离婚率增高，也导致“生育共同体”的崩溃。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率高一方面浪费生育时间（家庭内战耗费时间，重新恋爱结婚也需要时间）；一方面使得女性没有安全感，不敢生孩子；另一方面使得抚养成本（物质、感情、精力成本）增高。欧美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韩国等东亚国家后来居上。[《各国离婚率调查中国离婚人数迅速上升》，《环球时报》2006年5月15日第16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婚率持续增加，1978年仅有28.5万对夫妻离婚，而2011年共有211万对夫妻离婚。[王敏：《中国高离婚率背后的婚姻困境》，《社会观察》2011年第03

期。][王南：《北京登记离婚数增幅创7年新低》，新华网（来源：法制晚报），2012年02月02日]

7、就业和生活压力大。在农业社会，生活节奏慢，与自然环境打交道，能够预测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物质上虽然贫穷，但心理上比较安全，自杀率低。现在打交道的是人和社会，“就业替代”频繁，就像紧抓扶手站在快速行驶的敞篷车上，对车开往何处茫然无知，提心吊胆防止掉下去，心理安全感下降，自杀率高，更何况生儿育女了。1950年以来，全球自杀率在不断提高。日本、韩国、俄罗斯、东欧的自杀率非常高，[WHO,"Suicideratesper100,000bycountry,yearandsex(Table)".WorldHealth Organization.2011.]生育率也是非常低。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自杀率较低，生育率也较高。古代游牧民族由于身体四处飘荡，人口很难增加；现在城市人口心理在游荡，不敢生孩子。

8、妇女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提高。教育时间的延长不但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意愿，也使得女性育婴期大为缩短。就业压力大，使得夫妻双方都得工作才能保证家庭的经济安全，妇女就业率上升，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也担心生孩子会造成物质、工作机会（包括升职）、技能上的损失。

9、婚龄、育龄延迟，性生活减少。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岁时有18%没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岁时候有51%没有生育。[“Mostwomenbornfrom'71to'74childlessat30”,TheJapanTimes,March4,2006

,]而20岁出头是妇女黄金生育年龄，生育质量和生育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下降。很多妇女陷入了“有生育能力时没有生育条件，有生育条件时没有了生育能力”的矛盾之中。古代50岁妇女还“必与五日之御”；现在由于电影、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有很多三十多岁的夫妇就已经疏于敦伦之道了。

10、不孕不育比例剧增。根据医学统计，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快速上升到（1/8育龄夫妇不孕不育），接近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鲁海燕：《我国不孕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成为第三大顽疾》，人民网，2005年06月14日，][陈烨菲：《中国不孕不育患者20年增长三倍数量超过4000万》，人民网，2010年11月09日，]而用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高峻,高尔生：《中国育龄妇女不孕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卫生统计》2005年01期，第27-29页。]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第一章 第八节、“人口灾难”的狼真来

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混乱导致生殖器感染、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精神压力增大、不健康的食物等均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性病导致男女生殖器的炎症、堵塞造成不孕。性伙伴多，混杂的精液常易致敏，在女性体内产生抗精子抗体，增加不孕的风险。

与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并且精子的活力也在降低。美国的一位化学教授甚至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杨孝文：《科学家惊讶发现精子也有团队精神》，人民网2004年07月08日，]钟南山院士担心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就丧失了。[贾也：《食品安全关乎国运兴衰》，《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5第11版。]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精子减少呢？阴囊温度低于体温2°C～3°C左右是确保精子发生的必要条件。但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阴囊脂肪过多、久坐导致静脉曲张使血流速度减慢而不能散热，泡热水澡、穿紧身裤、用笔记本电脑等都可以使得阴囊温度提高，从而抑制精子产生，减少睾酮分泌。肥胖男人精液中的DNA发生断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古代皇帝生育能力不高，比如晚清三代皇帝都没有孩子，可能与生活水平高有关。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症可导致女性卵巢功能异常（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子宫发育不良、性机能异常及外阴、阴道炎等妇科疾患。

11、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年轻一代生理上早熟，而心理上却晚熟。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下降。

12、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代表的控制人口组织，耗费巨资制造“人口危机”的舆论，形成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资助发展中国家推行家庭计划/计划生育政策，对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的下降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这些可以称之为控制人口发展的不为人知的“右手”——由于社会进步而带来的对人口发展的抑制。

可见现代控制人口的“右手”虽然比古代的“左手”要温柔，但更加有效。现代经济制度、教育模式等存在致命的缺陷，使得人口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第九节、世界人口展望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0年修订版》分四种方案预测了今后的世界和各国人口变化，[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 其中高方案认为世界平均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2.52上升到2020-2025年的2.84，然后缓慢下降到2100年的2.5，世界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158亿人。中方案则认为生育率将缓慢下降到2100年的2.03，总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101亿人。低方案认为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到2050年的1.71、2100年的1.55，2047年人口会增加到8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100年

的61.8亿人。如果各国都“稳定现有生育率”的话，那么世界总人口会增加到2100年的268亿。

图2世界历年总和生育率和人口

联合国高方案是假定中国的生育率从2005-2010年的1.64不断上升到2095-2100年的2.51，总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1亿（占全球）增加到2050年的14.79亿（占全球）、2100年的15.87亿（占全球）。

第一章 第八节、“人口灾难”的狼真来

中方案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的1.64逐渐回升到2095-2100年的2.01，总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3.98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96亿（占全球）、2100年的9.41亿（占全球）。

低方案则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将从2005-2010年的1.64下降到2020-2025年的1.03，然后在逐步回升到本世纪末的1.51，总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3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1.30亿（占全球）、2100年的5.06亿（占全球）。

如果“稳定现有生育率”（联合国认为中国为1.64）的话，总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4.14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3.03亿（占全

球）、2100年的8.28亿（占全球）。

在高、中、低、“稳定现有生育率”的方案下，印度人口（2010年为12.2亿）将增加到2050年的19.52亿、16.92亿、14.57亿、20.20亿，然后在2100年分别为25.69亿、15.50亿、8.80亿、33.20亿。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是错误的：

1、对现有人口和生育率的判断是错误的。联合国高估了（故意？）发展中国家现有生育率和人口，比如认为2010年世界、中国、印度的生育率分别为2.48、1.64、2.64。但是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只有1.18，印度的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2.5（城市为1.9，农村为2.8）。[Officeoftheregistrargeneral,“estimatesoffertilityindicators,”sampleregistrationsystemstatisticalreport2010,ministryofhomeaffairsgovernmentofindia,NewDelhi,,]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2》也认为2010年世界生育率为2.45，其中中国为1.598，印度为2.625。如果将中国、印度的生育率更正为1.18、2.5的话，那么2010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其实只有2.3（生育率为2.48或2.3，用于远期预测的话，结果将是相差甚远）。考虑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高估了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那么2010年世界实际平均生育率还没有2.3，而是已经逼近世代更替水平了。

2、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从人均GDP看，2010年世界人均GDP（以2000年的美元可比价为基准）相当于欧盟1960年的水平。从教育角度看，2009年世界平均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为（发展中国家只有），[“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还只相当于欧洲国家20世纪60年代水平。[BriseidOleandFran?oiseCaillods,“TrendsinSecondaryEducationinIndustrializedCountries:AreTheyRelevantforAfricanCountries?”París,IIEP-UNESCO,2004.]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还将步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的老路继续下降几十年，只是速度更快（因为避孕手段更便利，电脑、电视、网络更普及），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未富先老，缺乏鼓励生育的“动能”，生育率下降后更难回升。发达国家则可能会沿着中方案或“稳定现有生育率”走。总体来说，今后几十年世界平均生育率将沿着低方案、甚至更低的路线走，

但联合国却通过媒体大力宣传中、高方案，说全球人口会达到100亿、150亿，对全球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抑制人口增长。[TimWorstall,“UNPopulationPredictions:UpTo15Billionby2100，”Forbes,10/23/2011,]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从来没有准确过。比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中方案对中国人口峰值预测从2008年版的2032年达到14.66亿（吓坏了中国领导人）下调到了2010年版的2027年达到13.98亿，对2050年中国总人口的预测也从2008年版的14.17亿下调到2010年版的12.96亿（相差1.2亿）。这是因为联合国2008年高估了中国的生育率，认为中

国2005-2010年、2010-2015年生育率分别为1.77、1.79；而2010年版将之分别下调到1.64、1.56，其实仍然是高估，因为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1996-2010年生育率只有1.4左右，2010年只有1.18。

可以说，二十世纪面临的是人口爆炸和经济繁荣，而二十一世纪面临的将是人口坍塌和经济衰退，联合国人口基金需要承担历史责任。

第二章 第一节、先哲谈人口与文明的关

新陈代谢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没有人口的“生生不息”就没有文明的“生生不息”。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里写道，“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特别是过去300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时，他们变得高度警觉，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我们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了文明人，而造成这一增长的正是文明：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书本知识不能使某个地方的1万人在原子弹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猎采摘的生活。”

英国《新科学家》2006年10月12日刊登文章，认为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失20万年后，将再也找不到人类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痕迹，地球将会变回到史前蛮荒世界。另外一群原始人类（假如数量足够，并且也有足够的运气的话）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现在的文明程度。[沈志真：《科学家预言：人类消失20万年后将遗迹全无》，人民网，2006年10月13日，]

中国古代先贤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文明延续和国家强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严梅福，张宗周：《中国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学》1996年03期，]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

《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人者，国之本”。

《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国防承担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孔子认为“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第二章 第二节、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

战国群雄纷争，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战国初期的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人口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比较落后，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愤然喊出：“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下令求贤，商鞅应召入秦。经过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当时制约人口发展的是粮食，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1、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织。原来井田制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舍地而税人”，将军赋从过去的“因地而税”改为按人口征收（等于是鼓励开荒）。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于是老百姓便“喜农而乐战”。

2、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需要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人口比例，手段之一是提高粮价，“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现在生育率低，从事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比例低是重要原因。

3、降低农业税赋。对农业是“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使得“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农业就能得到发展。

4、防止超前消费。商鞅提出“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抬高耗粮的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那么粮食就可以最大程度用来养活人口。现在，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如果以2012年的消费能力追求2050年的消费，必然降低养育孩子的能力。

5、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推行小家庭政策，鼓励生育：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成年后必须结婚

分家。缩小贫富差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树立清纯的民风，反对淫乱。禁止私斗，加强社会治安。

6、理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商鞅认为：“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这种观点非常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物质资本的报酬是递减的，如果积聚黄金，那么会贬值的；人力资本的报酬是递增的（人口分母可以转变为GDP分子），如果积聚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转变为人力资本，人财两旺。现在中国的很多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还达不到商鞅的学术境界，认为减少人口分子可以提高人均GDP分母，牺牲可增值的人力资本换取不可增值的物资资本。

7、充分利用土地和人口资源。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商鞅的这一观点与管子、墨子的观点一致。管子认为，“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正，命日武满。三满而不止，国非其国也”。墨子认为，缺少人口耕种的土地，只是一种得不到收获的“虚地”；所以，贤明的统治者应当使国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积极利用人口资源，而认为是“人满为患”，希望减少人口。中国现在一方面是“人满”，一方面是“地满”（土地无人耕种，工厂缺人干活）。

第二章 第二节、秦国统一中国的人口因

8、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商鞅认为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土地即使肥沃，人民虽然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直到被别国分割。而中国现在的人口危机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统计出了问题，经历了两次人口普查，竟然连生育率都拿不准，人口总数竟然靠推测。

9、积极解决“人地矛盾”。商鞅认为如果“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那么“民胜地务开”。就是说，人多地少就应当开荒、辟土，比如秦国修建都江堰和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成为秦国的粮仓。而中国现在一些学者却主张采取用“减少人口”的消极的方法来应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来提高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

10、积极的移民政策。商鞅认为如果“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那么“地胜其民者事徕”。换言之，地多人少就应当吸引移民。商鞅总结认为，秦国以前虽然也打过胜仗，但是对方并不屈服，就是因为秦国仅能获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商鞅建议秦孝公发布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界之内，岭坡、土山、洼湿的土地，十年不收赋税。秦国让原居民征战，让新移民务农，农战两不误。商鞅建议用军队春天围敌国农田，夏天去吃其贮粮，秋天收其秋粮，冬天挖其仓粮，敌国的人口就无法繁衍起来；秦国同时用宽厚的文德吸引他们的人口、安抚他们的后代，秦国人口却不断增加。除了吸引外来移民外，还必须防止本国人口外移。商鞅认为，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

会去投靠。美国是很好地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既鼓励生育，又吸引移民。而中国目前一方面不让生育，一方面却又缺乏凝聚力，大量富人携带巨资外移。

秦国在其后的征伐中，“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不光是获得土地，更获得人口（包括张仪、范雎、李斯等人才）。李斯继承了商鞅的人口思想，提出“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士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李斯认为，即使像秦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有很多东西不能自足，需要通过贸易等途径从其他国家获得。而现在中国很多人口学家却以资源不足为理由而要求减少人口。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的时候，秦国土地和人口已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商鞅的战时经济学在135年之内将弱秦变为强国并最终统一中国；但其过分崇尚行政权力、军事征服，“严而少恩”，“仁义不施”，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又播下了得天下后“二世而亡”的种子。

由于秦国钳制思想，虽然人口众多，但智力来源却非常有限，治理国家主要依赖于客卿，即便秦二世没有灭亡，但是统一之后没有了客卿来源，也很难继续治理好国家的。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法家独强，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妨碍了文明的发展。汉朝再度实现统一后，继承了秦政中有益部分，又以道、法并用，王道、霸道

兼行，才赢得一段稳定发展期。但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至今没有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如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用阴阳家、道家奠基，法家立柱，儒家盖顶，墨家砌墙，名家装修，那么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必将更加辉煌。

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

第二章 第三节、罗马帝国灭亡的人口因

2004年美国作者菲利普·朗曼在他的《空摇篮》一书中写道：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首次出现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胁着现代社会。[PhillipLongman,TheEmptyCradle——HowFallingBirthratesThreatenWorldProsperityAndWhatToDoAboutIt，NewYork:BasicBooks,2004.]

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到底是怎么灭亡的？有些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使得人口减少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刘达临：《世界性史图鉴:性的社会史》，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季朋（Edward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家庭和婚姻的衰败。

罗马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日，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古罗马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与个人利益脱钩，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女奴大量涌入和公共娼妓制的兴盛，直接冲击和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无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减少。

3、由于罗马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帝国并且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不孕。

历史学家杜兰（WillDurant，1885—1981）说娼妓在古罗马是如此地普遍，以致某些时候政客的选举必须透过“妓院老板行会”来收集选票。他说：“奸淫普遍猖狂到一个程度，导致性行为若非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根本就引起不了大众的注意。而实际上每个小康家庭的女人都至少都有过一次离婚的记录”，“娼妓猖獗，同性恋因着与希腊人及亚洲人接触而受到更大的鼓舞。许多有钱人为求得一名男性的欢心而不惜付出一台仑的价钱，加图(Cato)抱怨说一名漂亮的男孩远比一座农场的价值还高”，“罗马人就像希腊人一样，始终十分纵容男人去嫖妓，认为这些职业是合法并且是有限止的老塞尼加认为罗马女人中充斥着奸淫的行为。”[WillDurant,TheStoryofCivilization-CaesarandChrist,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44.]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层自由民人数不断减少。据记载，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了婚的王爷，半数以上没有生育；其余的王妃虽然有喜，活着生下的只是少数几个低能儿，皇室几乎没有嫡生的子女。[《铅与古罗马宫廷灾难之谜》，《现代社会中的化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一路攻击沿途的日耳曼人蛮族（包括西哥特人），日耳曼人蜂拥逃向西方，以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定居于罗马帝国内部和周围的日耳曼人生育率很高，人口

众多，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

第二章 第三节、罗马帝国灭亡的人口因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控制了罗马的粮食来源。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三天三夜的洗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是欧洲文明的倒退。正如帝国灭亡后在基督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弱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这段长达一千年的历史被称为"中世纪"。

假如古希腊、罗马帝国没有因为人口问题而灭亡，那么工业革命可能更早会发生，人类也可能更早地步入现代文明。

基督教于公元1至2世纪传入罗马，在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容易被许多人接受。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

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基督徒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Spengler,“Faith,fertilityandAmericandominance——TheEmptyCradlebyPhillipLongman,”AsiaTimesOnline,Sep8,2004,]可能是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现在西方一些人士担心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又在欧洲重演。欧美国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世纪以来生育率就不断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生育率普遍跌到更替水平附近。二战后出现了一个婴儿潮，60年代初欧盟的生育率达到2.6，美国则达到3.6。

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大批量生产，口服避孕药在市场推出，加上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外性行为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掀起了“性解放”风潮，离婚率增加，结婚率下降，性病泛滥。社保制的建立，生育的付出与养老收益脱钩，生育对个人变得没有多大益处了。60年代欧美的生育率再次下降，美国在1976年降到1.74后止跌回升，到1989年回升到2.0，其后一直稳定在2.1附近。欧洲的生育率一路狂跌，2001年欧盟只有1.45，其后略有回升，但2009年还不到1.6。欧洲人口将从2015年开始负增长。

劳动力的短缺，使得欧洲在1960年代就开始吸引穆斯林移民。所有的西欧国家都面临着穆斯林人口剧增的问题。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2%上升到1990年的、2000年的、2010年的，到2030年将达到。

表1欧洲各国穆斯林人口（万）、占总人口比例（%）、生育率[“TheFutureoftheGlobalMuslimPopulation:Projectionsfor2010-2030,”PewResearchCenteronReligion&PublicLife,January27,2011，]

2010年 2030年 2005-2010年生育率

人口 比例% 人口 比例% 穆斯林 非穆斯林

法国 470.4 7.5 686 10.3 1.9

德国 411.9 5 554.5 7.1 1.3

英国 286.9 4.6 556.7 8.2 1.8

意大利 158.3 2.6 319.9 5.4 1.4

西班牙 102.1 2.3 185.9 3.7 1.4

奥地利 47.5 5.7 79.9 9.3 1.3

比利时 63.8 6 114.9 10.2 1.7

丹麦 22.6 4.1 31.7 5.6 1.8

希腊 52.7 4.7 77.2 6.9 1.6

荷兰 91.4 5.5 136.5 7.8 1.6

挪威 14.4 3 35.9 6.5 1.8

瑞典 45.1 4.9 99.3 9.9 1.8

瑞士 43.3 5.7 66.3 8.1 1.4

穆斯林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201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中30岁以下人口占，而非穆斯林中30岁以下人口只占。一方面由于穆斯林的生

育率高，一方面由于年轻人口（现在和今后的育龄人口）比例高，这就意味着今后穆斯林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

二战后，强大的实力赋予了欧洲人“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唐朝也是如此），各国政府对移民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穆斯林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4架民航客机，撞坍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以“9.11”事件为转折，欧洲的种族关系转趋紧张，发生了多起穆斯林恐怖袭击事件:

2004年3月11日上午，西班牙马德里发生的系列爆炸案导致190人丧生，受伤人数超过1500人。

2004年荷兰电影制片人兼报章专栏作家特奥·梵高因在纪录片中对妇女在伊斯兰世界的现状做出抨击，遭到枪杀。

2005年7月7日早上交通尖峰时间，伦敦连环发生了至少7起爆炸案。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共52人，伤者逾百。

2005年9月30日在丹麦《日德兰邮报》上刊出负面描绘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导致穆斯林民众的抗议，也带来部分极端分子的恐怖威

胁。

2005年10月，法国数十个城镇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焚车近万辆。

从此，欧洲人对穆斯林移民的“反感度”达到了峰值，很多人认为欧洲本土的文化特征正受到威胁，担心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将不复存在。多元文化失败论在欧洲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公开承认“多元文化努力彻底失败”。[王方，纪双城，董铭：《多元文化失败论在欧洲蔓延》，《环球视野》第329期（摘自2010年11月15日《环球时报》），]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多元文化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捍卫西方价值观。[《英首相卡梅倫稱國家文化多元主義已死亡》，BBC中文网，2011年2月5日，]接着，法国、荷兰等国也承认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开始强调“主导文化”。[李文堂：《西方也讲“主导文化”？》，人民网，2011年11月17日，]

2011年7月22日挪威于特岛发生枪击案，造成92人死亡，97人受伤。凶手安德斯·布雷维克是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承认，政府奉行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其犯罪的动机之一。挪威惨案向欧洲敲响了警钟：欧洲地区反对移民、反对伊斯兰和反对多元文化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大增。

今后欧洲将陷入两难的境界。一方面，以2010年为转折点，总劳动力开始减少，经济很大程度将依赖移民。但另一方面，劳动力减

少后，经济将出现长期的衰退，大众心理将由开放转向保守，很容易将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治安恶化归罪于移民。欧洲近年的排外思潮兴起其实是经济衰退的一个标志。移民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对移民是“排斥”还是“利用”将考验欧洲政要的政治智慧。

从人类文明长远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其实是好事。穆斯林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在继续上升，从1950年的上升到1970年的、1990年的、2010年的，预计将增加到2020年的，[HoussainKettani,“WorldMuslimPopulation:1950–2020,”InternationalJournalofEnvironmentalScienceandDevelopment,Vol.1,No.2（June2010），，]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穆斯林人口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言权将不断上升，他们也必将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章 第四节、人口优势避免了罗马帝

东西方历史有些相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同期，两地的科学与文明迅速发展，在数学、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几乎同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中国涌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先哲，希腊涌现了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师。中国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被秦始皇焚毁，汉朝只继承了残存的文明。古希腊人的文明遗产也只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其中科学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才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重新回到欧洲大陆。

与罗马帝国同期的是中国东汉、魏晋时期。魏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淫乱的时代，士族饮酒服药（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尽情享受声色，崇尚空谈和阴柔美，玄学兴起。好男色，“狎昵娈童”成为一种时尚，且公然予以歌咏。美男子“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儒家东晋史家干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搜神记》卷七）。干宝评价“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干宝将这些现象与其他现象一起视为西晋败亡之兆，“胡狄侵中国之萌”。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西晋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渭二水流域，势如弧形，包围晋都洛阳。晋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钦请徙胡族於塞外，并以汉人实边以绝胡患，武帝不纳。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山阴令江统作《徙戎论》，文中提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认为若不立刻徙胡，晋室岌岌可危。江统的建议也未被采纳。

西晋王朝爆发八王之乱，各派皇室宗亲和军阀们为了争夺权利，竞相雇佣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军队，大批蛮族部族潮涌般冲入华夏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带。一方面是淫乱、礼崩乐坏的西晋王朝，一方面是剽悍的胡风。在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互相混战的动荡时期，史称“五胡乱华”。

干宝在《晋纪总论》谴责西晋：“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礼法刑政，於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应詹在给元帝上疏总结西晋灭亡的原因：“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晋书·应詹传》）。

经过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汉族人口急剧减少。部分汉人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东晋偏安江南，保存了文明。《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而北方五胡互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甚至从此消亡），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留在北方的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隋唐的建立创造了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在此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东方文明一直占有优势。

有人说蒙古族和满族凭借很少的人口仍然征服中国，因此人口多少意义不大。其实正如商鞅所说："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蒙古和满族能够征服中国，主要原因是汉朝之后（尤其是宋朝之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刻意弱化民间力量，虽然中国总人口多于蒙古和满族等民族，但是可以动用的力量反而不够。而蒙古和满族却充分利用他们的人口资源。但是蒙古和满族虽然能够通过武力征服中国的政权，但是不能征服中国的文化（必须靠人口）。最终这些民族反而被同化。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政权虽然被征服过，但是中华文化从没有被征服过。

第二章 第五节、吐蕃、蒙古文明衰落的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西藏人口有800万。[《从数字看西藏》，新华网（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04月14日，]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但是西藏后面喇嘛教兴起，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将大量财富用来修建众多的寺庙，进一步降低老百姓养育孩子的能力。吐蕃人口减少，对中原政权不再构成威胁。1953年，全

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藏族只有277.5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藏族人口541万，占中国人口的1/233。

毛泽东认识到西藏的制度不利于人口发展，他在1959年说："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毛泽东：《毛泽东对西藏平叛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引自：中央电视台网站：]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蒙古帝国并拥有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战马，13世纪蒙古铁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无数的古代文明遭到彻底毁灭，无数个城池被夷为平地，数千万人被屠杀，征服的疆域面积超过4000万平方公里。但很快就因为本民族人口的局限不能承受扩张带来的压力而崩溃，其强大不过是昙花一现。

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蒙古共被分为了200多个盟和旗，始终被束缚在各自的地域，不能统一在一起形成人口规模优势，这样就不会威胁满清的统治。康熙《大清会典》规定："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

满清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控制蒙古族的人口。“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兴安盟科右前旗葛根庙历史初探》，内蒙古新闻网，2004年9月4日，]1792年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喇嘛说》碑文，立此碑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根本宗旨，阐明这是“所系非小”的“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的大政方针。[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

第二章 第五节、吐蕃、蒙古文明衰落的

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长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在中国总人口由数千万增加到4亿多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

冯玉祥将军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

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冯玉祥：《我的生活》，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三十三章赴俄途中。]

1908年《民报》发表了署名蒙裔多分子，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蒙裔多分子:《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民报》，1908年第20号《来稿》，第113页。]

解放后由于摆脱黄教的束缚，中国的蒙古族人口快速增加，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8.8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676），2000年增加到399.53万（是1953年的4.5倍，占中国总人口的1/317）。而蒙古国的人口也从1950年的78万增加到2000年的241万（是1950年的3.1倍）。可见满清政府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卓有

成效”的。公正地说，解放后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蒙古族的人口发展的。

第二章 第六节、印第安文明衰落的人口

数千年来印第安人在美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对天文、数学、历法、雕刻技术有卓越的创造，尤其是农业非常发达，最早培植了玉米、马铃薯、红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等农作物，并掌握了饲养火鸡、狗和密蜂的技术。

但印第安人却没有欧亚大陆所有的水稻、小麦、燕麦等谷类作物，也没有牛、马、羊、猪等大牲口。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基本没有大规模饲养业，餐桌上虽然有玉米，但是肉类却非常有限（主要肉食是豚鼠肉）。不会使用轮子，又没有大牲口，也就没有马车等运输工具。印第安人一直不会使用铁制工具，耕种技术比较原始。

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玛雅文明辉煌两千年后却在公元9世纪突然走向败落，数十座古老的城邦同时被废弃，逐渐为森林所淹没。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印第安人仍然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

由于人口仍然众多，印第安文明的火炬并没有熄灭。对1492年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总数，不同的学者估算结果不一，从840万到1.12亿人不等，比较准确的估计是5000万到6000万人，其中秘鲁人口

为400万到1500万，中墨西哥人口为500万到2500万人，中美洲人口为225万到545万人。[PeterBakewell,JacquelineHoller,AHistoryofLatinAmericato1825(3rdEdition),Hoboken:Wiley-Blackwell,2009,]要知道1403年明成祖时期，中国人口也才6660万人；[《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网站：]目前30个西欧国家在1500年的时候总人口也只有5700多万人（2008年人口为4.01亿人）。[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6AD，”

]如果假以时日，印第安人文明仍有机会复兴。

然而随着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战争屠杀和欧洲传来的流行病，使得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下降到1568年的265万人、1595年的137.5万人、1625年的73万人。秘鲁的人口下降到1570年的130万人、1620年的70万人。[PeterBakewell,JacquelineHoller,AHistoryofLatinAmericato1825(3rdEdition),Hoboken:Wiley-Blackwell,2009,]美国的印第安人人口也从1492年的150万人快速减少，后面逐渐增加，但到1920年的时候仍然只有35万人。[The,“changingAmerica:theUnitedStatespopulationintransition,”,Vol4,No2(JUNE1999),://]很多印第安人部落彻底灭绝。

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并非欧洲人的枪炮（1500年西班牙总人口才680万，靠枪炮是难以征服五六千人口的美洲的），而是他们带来的疾病。天花、霍乱、腮腺炎、麻疹、淋病和黄热病，这些

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力。比如欧洲人当时的天花病死率只有10%，而印第安人则高达90%，天花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同盟军。[谢来：《传染病打败印第安人？》，《新京报》，2006年5月21日，@]

一方面是印第安人人口的崩溃；一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铲除一个文化，如同路人随手折下路边一朵向日葵”，印第安人的文献被殖民者当作“魔鬼的作品”付之一炬，曾经辉煌的印第安人文明彻底崩溃。作为美洲新主人的欧洲人然后得意地宣扬“印第安人无文明”。[《丛林中的神话：玛雅文明》，新华网（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03月24日，]

同样，在英国人入侵澳大利亚的时候，天花等传染病也成了最得力的同盟军，1789年，在与新近到达悉尼港口的英国定居者为邻的澳大利亚土著人中间暴发了天花，并向内陆扩散。据英国人估计，当时这场天花杀死了50%的土著人。此次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遇到过的最大的一次“人口地震”。[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人口的崩溃必然导致文明的崩溃。

第二章 第七节、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

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60年代，瓦特改良蒸气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

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国其他地区和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

是什么原因导致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偏僻的岛国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发生？这个问题吸引了很多经济学家。杨晓凯综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SimonJohnson）等人的观点。[杨小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在西班牙发生》，《南方周末》，2003年4月24日，]强森等人比较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当时的条件，他们发现，西班牙、葡萄牙发生工业革命的客观条件远远比英国要好：

1、西班牙、葡萄牙较早掌握并拥有相对优良的航海技术和经验。

2、西班牙、葡萄牙早于英国从事航海贸易，率先占领了自然条件优于北美的南美洲，有更好的自然资源进行国际贸易。

3、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剥削为手段，但英国对各殖民地的治理并非纯粹以剥削殖民地满足本土为目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对殖民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剥削。所以，依照马克思以及边缘理论的说法，工业革命本应发生在西、葡两国。

但历史却让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而不在西班牙发生。面对这种历史矛盾，强森等人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假说。

1、大西洋贸易对欧洲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影响。

2、大西洋贸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转变。

3、制度转变的前提条件与国王和皇室专制权力的强弱有关。

强森等人发现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英国对专制王权的限制明显多于西、葡，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国家垄断独占，并且私有财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西班牙从事大西洋贸易所得到的好处却由皇室所垄断。换句话说，英国是由民间自发地参与大西洋贸易，是“私营”，而不是王室出资靠“国营”。因此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

杨晓凯极为推崇强森等人的这种观点，并说现在的太平洋贸易就像当年的大西洋贸易，中国的太平洋贸易有让中国“西班牙化”的倾向。

强森、杨晓凯的这些观点解释了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但是却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法国。法国也是当年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也直接从这些贸易中得益；法国大革命前虽然政治专制，但是经济却比较自由，并且“薄赋轻徭”，普通百姓也能分享经济利益，在大革命后，法国对专制的限制更甚于英国。

依照强森、杨晓凯的观点，工业革命能够发生在英国，那么更能发生在法国。

但杨晓凯在《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一文比较英国和法国时，却又赞扬英国政府的高税率。杨晓凯认为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依照杨晓凯的这种观点，那么西班牙政府比英国政府更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工业革命又应该发生在西班牙才是。

因此，强森、杨晓凯对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解释虽然有很多合理成分，但是并不充分。因为他们忽略了生产力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

如果说中国和印度是因为没有文艺复兴而没有工业革命的话，那么同样沐浴了文艺复兴春风的欧洲国家，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却是英国，而不是文艺复兴起源地意大利，不是航海强国西班牙，也不是近代世界宪法文化的发源地法国。其实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的主要原因是人口。

第二章 第七节、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

如无特殊说明，本节和下面几节的人口和GDP数据均采纳安格斯·麦迪森的资料。

[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6AD，”

]

表21500-2008年欧美各国人口（百万）

年份 1500 1600 1700 1820 1850 1900 1950 2000 2008

英国 60.9

爱尔兰 4.2

法国 64.1

德国 82.4

意大利 2 4 58.1

荷兰 16.6

葡萄牙 10.7

西班牙 1 40.5

前苏联 7 12 283.7

美国 15 2 304.2

当英国人口因为引进美洲高产作物而使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后，马铃薯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人逐渐接受，人们最初迷信地认为，它会引发麻风病甚至不育症。法国大文豪雨果还曾把马铃薯称作“可怜虫的块菌”。[《历史烽烟难掩哥伦布传奇是冒险家还是征服者》，新华网（来源：新京报），

2006年05月21日，]

1500年法国人口1500万，大不列颠（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70万左右，法国人口是大不列颠人口的3.2倍。从1500年到1820年，大不列颠人口增加了5.0倍，而法国、德国、意大利人口分别只增加了1.1、1.1、0.9倍。

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引起英国人马尔萨斯的担忧。但马尔萨斯理论在英国并没有市场，英国仍然保持中世纪的基督教生育文化，尤其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1837-1901年在位）整个英国严格执行禁欲主义（可以保证家庭稳定促进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然而法国人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

工业革命需要两种人：大量脱离土地的科技创新人员，大量自由劳动者。只有英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我们看看英国当时的情况：

1、劳动力脱离土地。

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毛织业的发展。为了增加羊毛的数量，18世纪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使农业完全纳入资本主义轨道。

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并且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革命。18世纪30年代，三叶草和芜菁被引入大田，增加了土壤肥力，改三轮制为四轮制。农业家贝克韦尔培养出“新莱斯特羊”，开改良牲畜之风。

一方面是人口急剧增加，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人口需求减少，这就导致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样，中国1979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为其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农业基础。

2、工业发明。

纺织工业：

第二章 第七节、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

1733年，钟表匠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效率。

1764年-1767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

1769年，理发师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

1779年，纺织工人克隆普敦发明了骡机，后被改良成自动棉纺纱机。

1785年，牧师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随后其他纺织机器相继发明，实现了纺织行业的机械化生产。

1769年，仪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发明了单向蒸汽机，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

3、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英国由于人口增加快，每年增加大量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上面可见，英国的这些工业发明大多是一线年轻工人，要是这些人仍然在土地上谋生，是不可能有机会作出发明的。有大量的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而这又是人口压力逼出来的。

法国耕地面积是英国的3.04倍，草原面积则只相当于英国的。["LandandAgriculture,"UnitedNationsStatisticsDivision,lastupdate:October 2010,]1500年英国人口394万，只相当于法国人口（1500万）的，人均耕地是法国的1.25倍，人均草原面积则是英国的4.47倍，当时两国的人均GDP基本一致，英国是714美元，法国是727美元。

1700年英国人口增加到857万，相当于法国人口（2150万）的，人均耕地只是法国的83%倍。1705年英格兰只有35%的劳动从事农

业，而法国还有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英国人均GDP增加到1700年的$1250，高于法国的$910。

到1850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增加到2718万，已经相当于法国人口（3640万）的，人均耕地只是法国的44%，人均草原是法国的1.57倍。

那么可以看出，当时法国耕地丰富，一方面没有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民在土地上就可以谋生，没有必要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到城市讨生活。到1845年，法国还有5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英国只有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了。[StephenBroadberry,KevinH.O’Rourke，TheCambridgeEconomicHistoryofModernEurope,Volume1-1700-187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p.149-151.]

以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0%计算，1850年的时候英国有1359万劳动力，其中1087万从事非农行业；法国有1820万劳动力，但从事非农行业的只有746万。就是说，虽然当时英国总人口仍然比法国少，但是脱离土地的自由人员却反而远比法国多。

1851年英国耕地单产只比法国多20%，[Clark,Gregory,“TheAgriculturalRevolutionandtheIndustrialRevolution:England,1500-1912,”WorkingPaper,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California,June,

2002,]光是靠本国耕地根本养活不了不断增加的人口，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为了生存，破产的农民纷纷转移到城市，通过贸易获得就业机会和粮食。1850年英国的人均GDP增加到$2,330，远高于法国的$1,597。

第二章 第七节、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

如果1500-1850年英国人口也与法国同步增长的话，那么1850年人口只有957万，人均耕地反而是法国的1.25倍，人均草原是法国的4.47倍。耕地和草原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就业机会和粮食需求，根本不必进城打工。

如果1700-1850年英国人口与法国同步增长的话，那么1850年英国人口只有1450万，自由劳动力还不到法国的一半。

有人认为刺激工业革命产生的两大最重要条件是：国际市场与资本市场。其实这两个条件在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之前，已经在荷兰完成了。但是荷兰的人口太少，到1820年人口才230万，如此少的人口一方面难以涌现瓦特那样的发明家，一方面自由劳动力难以提供广阔的市场前景所激发的生产能量。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因素只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而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诸多必要条件在英国得到完美的统

一。而当时英格兰中部人口最为稠密，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也就不足为奇了。

浙江温州和湖南邵东的情况也类似。两地人多地少，在计划经济时代非常贫穷。温州人均耕地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5；邵东人均耕地面积在湖南倒数第一，并且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改革开放后，迫于生计，大量温州人、邵东人到全国各地经商、创业，两地商人现在成了财富的符号。

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1990年英裔人口（包括English、Scottish、Irish、Scots-Irish、Welsh以及殖民地时代的英国人后裔American）共9683万（考虑到还有10%以上的人没有公布祖籍，因此英裔总人口应该超过1亿），占美国人口的（占公布祖籍人口的）；法裔人口1032万。[,“Ancestry:2000,”Census2000Brief,IssuedJune2004,,]

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统计资料，[“Ethnicorigins,2006counts,forCanada,provincesandterritories-20%sampledata,”StatisticsCanada,DateModified:2010-10-06,#Notes] 英裔1649万，法裔491万（主要是魁北克省），还有1007万认为是Canadian人（早期移民，以英裔为主），其中部分是混血人种。

英国和法国还向其他国家移民，也还有外来移民，假设二者抵消。1990年英国和爱尔兰人口共有6100万，法国5817万，澳大利亚1696万，新西兰341万。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

以上，此外南非还有160万左右的英裔，那么1990年大不列颠裔人口接近2亿，而法裔人口不到7500万。

就是说从1500年到1990年，当初474万大不列颠人口增加到近2亿，增加41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11.9倍），当初1500万法国人增加不到4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了2.9倍）。从文艺复兴开始到1492年这一段时间共有10位名人（哈特排行榜），都是欧洲大陆的，无一是大不列颠的。在1500年之后，影响世界的名人中大不列颠却有17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有8人，而传统的欧洲人口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分别只有8人、9人、3人。人口优势使得英裔人口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扮演主角，主导世界格局超过2个世纪。数百万人口使用的英语，现已成为世界语言。

法国本来一直是欧洲的中心。1662年（康熙元年）的时候法国人口2000万，中国人口四千多万，[易富贤：《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01期。]中国人口是法国的2倍多；2010年中国人口却是法国的20倍。1700年法国人口占西欧（2008年30国人口共4亿）的，GDP占；2006年法国人口只占西欧的，GDP只占了。随着人口比例的降低，法国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的传统霸主地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感叹说，人口决定命运！

第二章 第八节、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一直是整个欧洲的战场，松散的德意志各个邦国的人们经常成为欧洲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人口时增时减。德国人口在1500年为1200万，1600年增加到1600万，1648年“三十年战争”导致人口减少，1700年恢复到1500万，1800年增加到2900万。拿破仑1806年入侵，普鲁士等邦国遭遇惨败，人口也减少。1814年，拿破仑被反法同盟击败，在英国和俄国主导下，由38个邦国组成的“德意志邦联”成立了。1820年德国人口为2491万，1830年恢复到2804万。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1871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已经增加到3946万，成为欧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比俄国少），而此时英国和法国人口分别为3168万和3773万。

德国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压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国、法国那样从殖民地获取粮食等资源，这就迫使德国转向于科技创新。于是，德国一方面是人口大国，一方面又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加强科技创新，使得人口资源快速转变为人力资源。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被称为“近代大学之母”。凭借人力资源优势，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比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德国科学家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化肥。1913年德国人口增加到6506万，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人口的4565万和4146万。将不断增加的庞大的人口资源开发成人力资源是德国崛起的秘诀。

德国的直接竞争对手是邻国法国。1820年德国人口只相当于法国的80%，而到1913年却是法国的1.6倍。与人口优势相伴随的是综合国力大增。1820年德国GDP只相当于法国的76%，1871年只相当于英国的68%；但在1873年超过法国，1908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13年的德国的GDP是法国的1.64倍，是英国

的1.06倍。绝对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让德国在1914年悍然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除了德国外，还有奥匈帝国（5280万人口）、奥斯曼帝国（2400万人口）、保加利亚（470万人口），人口和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但是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人口大国加入协约国，彻底改变了战局。俄国当时虽然还是农奴制国家，还比较落后，但是1913年有1.56亿人口（是德国的2.4倍），GDP也接近德国；1913年美国人口（9761万）是德国1.5倍，GDP是德国的2.2倍。这种人口形势对比必然导致同盟国的惨败。战争使得德国的GDP减少了1/3，也使得人口减少到1919年的6055万。

1919-1939年间德国人口和经济增长都快于英国和法国，1939年德国人口增加到6929万，而法国和英国人口分别只有4190万、4799万；1939年德国的GDP是法国的1.87倍，是英国的1.25倍。绝对优势使得德国野心再次膨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1德国和法国的人口、GDP的比较

从局部看，以德国和意大利（1939年人口4387万，GDP是法国的77%）为主的轴心国是可以打败以英法为主的同盟国的，但同样由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加入，改变了战局的结局。1939年美国人口是德国的1.9倍，GDP是德国的2.3倍；苏联人口是德国的2.78倍，GDP是德国的1.15倍。战争不但让德国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国家也被一分为二。

1820年的法国人口是德国的1.25倍，GDP是德国的1.32倍；但是到1939年的时候，法国人口只是德国的60%，GDP只是德国的54%。短短的120年间，地缘政治和经济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德国除了本土人口增加较快外，还大量移民国外，美国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美国有5795万德裔，[,“Ancestry:2000,”Census2000Brief,IssuedJune2004,,]根据加拿大2006年人口统计资料，加拿大有318万德裔。[“Ethnicorigins,2006counts,forCanada,provincesandterritories-20%sampledata,”StatisticsCanada,DateModified:2010-10-06,#Notes]1700年的1500万德国人目前至少有1.5亿后裔。

但是风水轮流转，二战后德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法国，1975-2009年平均只有1.37，而法国平均还有1.86。法国人口相当于德国的比例由1943年的上升到2010年的。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0年修订版》，如果保持现有生育率不变，那么2100年法国人口将是德国的1.68倍，中位年龄是46.5岁（德国是56.5岁）。[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

第二章 第九节、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的

日本人口从1500年的1540万增加到1820年的3100万之后，与中国一样，人口停滞增长。1850年日本的人口、GDP分别相当于中国的、，人均GDP也与中国基本一致。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让日本走向强国之路。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口号，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发展近代工业；建立近代化军队，进行武士道教育。

其实，人口政策改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明治初年采取了奖励生育政策，对贫困家庭，发给育儿补贴，实行孕妇登记、死产检查制度，重视妇幼保健。1941年颁布了《确产人口政策纲要》，政府采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励一对夫妇生育5个孩子。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人口资源；一方面兴办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思想文化，通过教育将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从1850年到1894年（甲午年），日本人口从3200万增加到4135万，增加了；中国人口从4.12亿下降到3.88亿，下降了；日本人均GDP从$679增加到$1079，中国人均GDP从$600下降到$542。1894年甲午战争时，中国是在走下坡路，日本是在走上坡路。考虑到中国晚清政治也腐败，日本战胜并非偶然。

图2中国、日本的人口和GDP的比较

清朝战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获得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其中80%用来发展军力。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有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

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并获得港口特权。日本于1937年悍然发动了对华战争。

从人口角度更能看出当时中日实力的对比。1937年日本人口增加到7128万（是1850年的2.23倍），人均GDP增加到$2315；中国人口只增加到5.11亿（是1850年的1.24倍），人均GDP仍然只有$580。日本GDP总量相当于中国比例从1850年的提升到1938年的61%。并且日本的人口结构也比中国好，从事科技和工业的人口比例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又实行军国主义教育，聚集全国人力物力对抗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国、英国等国总人口和出生人口都下降；而日本每年出生人口仍然稳定在220万左右，[《男女別人口?人口増減及び人口密度（明治５年～平成２１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9月10日。]总人口还增加到1944年的7718万。并且当时日本已经占领朝鲜、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东部大片地区，利用这些地区的人口资源。如果单靠中国本国力量，是很难在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但1944年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8倍，GDP是日本的8.4倍，军事和科技也远超过日本。苏联人口是日本的2.3倍，GDP是日本的1.6倍。

可见，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的重要秘诀之一都是将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也符合商鞅“民众而用”的人口思想。而中国当时却是“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人众而不治，命曰人满”。胡适、张竞生、陶行知、马寅初等知识精英都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人满为患，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少人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刚好与德国、日本当年相反，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降低科教投入。中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从1979年之前的平均（最高为）下降到。中国高中在校人数由1978年的1553万下降到1981年的715万（直到2002年才再次超过1978年）；初中招生人数也从1977年的2368万下降到1981年的1363万。[中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一些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得靠“希望工程”。

德国和日本当时的人口压力大，以至于一些法西斯战争狂人认为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德国、日本本身就足以养活庞大的人口。日本1937年人口不到7000万，感到人口压力大，需要通过侵略来扩展地盘；2008年人口1.27亿，人均GDP是1937年的9.9倍，然而整个国家却陷入了另外一种恐慌，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第二章 第十节、“日”薄西山的人口因

明治维新之后，直到1949年，日本一直是鼓励生育，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资料，[《男女别人口?人口増減及び人口密度（明治５年～平成２１年）》，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2011年9月10日。]日本年出生人口由1872年的59.3万稳步增加到1920年的210万，此后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1946年则下降到157.6万（生育率下降到3.02）。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稳定，1947年、1948年、1949年出现了三年出生高峰，每年分别出生262.3万（生育率

回升到4.54）、270.3万（是1946年的1.7倍）、269.4万人，这个人群被称为“团块世代”。

图3日本历年生育率、出生人数、15-64岁人数、GDP占全球比例

“团块世代”及以前出生的人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些年轻劳动力不但数量多，并且素质高（工作的热情高、有责任心，且有熟练的技术）。

但是当时日本政界和学界对出生高峰极为惊恐，1949年内阁成立“人口问题审议会”。同年，众议院通过“关于口问题决议案”，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计划，人口政策由鼓励生育转变为限制生育。1954年，“人口问题审议会”要求把节育作为家庭计划的一部分。在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计划政策的双重推动下，生育率从1949年的4.3急剧下降到1952年的3.0、1956年的2.2。

美国的控制人口的组织在日本人口政策的这种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二战失败后，日本被美国占领。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派出专家（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弗兰克?诺特斯坦）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调研了三个月。1948年日本出台了优生保护法（可见日本的人口政策确实是受优生学的影响），放宽对堕胎的限制。日本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主体框架在美国占领时期（1945-1952年）已经基本确立。[Yu-

lingHuang,“ThePopulationCouncilandPopulationControlinPostwarEastAsia,”,DepartmentofSociolog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2009,] 可见，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意义不仅仅在战争本身。日本的计划生育组织和人口学家对中国后面的计划生育也起了推动作用。[周冬霖：《日本计划生育在中国》，《中日技术合作的背后——我所了解的日本JICA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1日第1版，]

20世纪40年代的出生高峰在60年代到了生育年龄，日本又出现了一个继发性出生高峰（尽管生育率并没有上升，仍然只有2.1、2.2），每年出生人口由1961年的161万增加到1973年的211万（还达不到战前水平），总人口在1967年突破1亿大关。这又引起日本政界和学界的惶惶不安，并曾一度计划将人口收缩到8000万左右。1974年4月，经“人口问题审议会”通过，正式发表了以“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为题的《人口白皮书》，强调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世界上最尖锐的，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的发展目标，并把优生优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视人口宣传教育，从1970年代起，开始在小学、中学、大学、加强人口教育。日本的控制人口计划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高度评价。

第二章 第十节、“日”薄西山的人口因

日本生育率从1974年的2.1降低到1975年1.9、1990年的1.5，1997年之后生育率稳定在1.3左右。2011年日本只出生105.7万人，不到战前的50%。由于育龄妇女在继续快速减少，今后每年出生人口还将继续下降。

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了人口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日本15-64岁的劳动力从1950年的4905万增加到1995年的8726万。年轻劳动力推动日本经济腾飞，1950年到197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10%以上。以现值美元为标准，[“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日本GDP占全球比例从1960年的上升到1994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均GDP从$479增加到1995年的$41968。日本人均GDP在1960年只相当于美国的，而到1987却超过了美国，1995年的时候是美国的1.5倍。日本出口占全球比例由1948年的快速增加到1953年的，1963年的，1973年的，1983年的，1993年的，成为世界工厂。[WorldTradeOrganization,“Worldtradedevelopmentsin2009,”][WorldTradeOrganization,“WORLDTRADE2010,PROSPECTSFOR2011,”7April2011,]日本在1990年总抚养比（非劳动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43%，中位年龄只有37岁，低抚养比和经济的繁荣也导致民众的民主政治热情高涨，于1993年完成了政治转型。

但是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1995年之后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年龄结构也不断老化），导致日本经济开始一蹶不振。

一方面年轻人口数量在减少，一方面缺乏创新活力、创业欲望和“团块世代”那样的吃苦耐劳精神，梁建章研究发现日本10大高科技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在过去30年中创立的，而美国10大高科技企业中却有8家是过去30年中创立的。[梁建章，李建新：《中国人太多了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0-73页。]日本占全球500强企业的份额从1995年的149家减少到2012年的68家。

日本GDP占全球比例从1994年的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人均GDP仅仅从1995年的$41968增加到2010年的$43137。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1995年的152%下降到2010年91%（购买力只相当于美国的72%）。国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首相频繁更换，老年犯罪率开始攀升，今后政治生态将大为改变，将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转向生存经济学、政治学。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到2024年，日本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水平。[FarrellD,GreenbergE,“TheeconomicimpactofanagingJapan,”McKinseyQuarterly,May2005,]

2011年日本总人口也开始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 2010年修订版》，如果保持目前的生育率水平，日本人口将下降到2050年的9657万（中位年龄将是56岁）、2100年的5521万（中位年龄将是60.4岁），日本今后将逐渐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极端老化的国家。

日本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降低到2010年的。在联合国中方案下，2050年、2100年日本人口占全球比例分别只有、；在低方案下，分别只有、。

第二章 第十一节、俄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于1243年建立了钦察汗国，统治着包括莫斯科公国在内的辽阔区域。1480年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击败钦察汗国分裂后的大帐汗国，使得莫斯科公国从大帐汗国独立出来。1546年，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沙俄诞生。当时的俄罗斯只是东欧一个人口稀少、闭塞的小国。原苏联区域所有地区1500年人口只有1695万（其中俄罗斯只有数百万人口），1700年也只有2655万。1682年彼得大帝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当时俄国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被欧洲大国看不起，类似于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国；彼得大帝类似于秦始皇。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动俄国展开了广泛的“西化”运动，学习英、法等国，以变革自己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局面，俄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

但是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无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都采用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方式，追求俄罗斯的强大。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听到法国革命的消息后，她公开指责启蒙思想是“法兰西的瘟疫”。当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家庭在享受现代生活而减少生育的时候，俄国仍然是农奴制国家，保持东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20年人口达到5476万（其时法国、德国、英国人口分别约为3125万、2491万、2124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181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俄罗斯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恩格斯曾这样指出：“惊慌的西欧，在伊凡统治之初还不知道北方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现在由于看到一个硕大的帝国出现在东部边境而目瞪口呆。”

由于农奴制带来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1860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1870年人口已达8867万，其后人口增加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在1913年达到1.56亿。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进行了

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使得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人口大国，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强国，到1931年之后苏联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战前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50%。

从1820年到1938年，俄国（苏联）人口、总GDP、人均GDP分别增加了2.44倍、9.75倍、2.12倍；中国人口、总GDP分别只增加了35%、26%，人均GDP还略有减少。1820年中国的GDP是俄国的6.1倍，但是到1938年的时候只是苏联的71%了。在这段时间内，俄国侵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爆发。虽然当时苏联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德国的40%，但由于有人口规模优势，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作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苏联人口损失较大，总人口由1940年的1.96亿下降到1946年的1.74亿，减少的两千多万人口中很大比例是青壮年劳动力，不但让苏联经济直接损失20%，而且也降低了苏联的经济的后续发展能力。而美国人口却从1940年的1.33亿增加到1947年的1.42亿，经济增长40%。

二战后苏联人口和经济恢复增长，1947年到1989年美苏人口基本同步增长，苏联人口相当于美国的比例稳定在116-119%；苏联GDP相当于美国的比例回升到1950年的、1960年的、1974年的（还是远不到战前的水平）。

可见，俄罗斯的崛起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加（从1700年到1940年，俄国人口增加了6.38倍，而法国人口只增长了91%），人口使得俄国的崛起延续了近300年才衰退。如果俄国人口增速与法国一样，那么即便崛起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成为一个地区强国就不错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厉害的要算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也"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来自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

第二章 第十二节、苏联解体的人口因素

苏联1991年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既然人是社会的主体，从人口本身分析应该最为准确。与那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找原因的事后诸葛亮不同，美国未来学家彼得·舒瓦茨（PeterSchwartz）在苏联解体几年前就认为人口决定了苏联即将崩溃。[PeterSchwartz,DougRandall,"AheadoftheCurve:AnticipatingStrategicSurprise,"inFrancisFukuyama,ed.,Blindside:HowtoAnticipateForcingEventsandWildCardsinGlobalPolitics,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07,p.93-108.]彼得·德鲁克（Peter）在1989年出版的《TheNewRealities》中也从人口结构角度预测了苏联即将解体。

图4苏联和美国的人口和GDP的比较

笔者比较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结构，发现1950年到1970年，美苏人口比例、经济比例基本保持稳定。1970年之后苏美两国人口比例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苏联和美国的人口比例在1970年为，这一比例缓慢降低到1980年的、1990年的；然后以1990年为转折，这一比例快速降低到1993年的、1995年的、2000年的102.3、2005年的。苏联和美国的15-64岁劳动力之比在196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却稳定在115%；也是以1990年为转折点，这个比例下降到1993年的、2000年的、2005年的。[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6AD，

]人口均势被打破，也意味综合国力的均势被打破。究其原因，

1、1940年之前俄罗斯（无法获得前苏联全部人口资料）的出生人口一直远远超过美国。[,,T.Kharkova"HistoiredémographiquedelaRussie.1927–1959",НАСЕЛЕНИЕИОБЩЕСТВО, № 31,Октябрь1998,]但是二战期间，俄罗斯每年出生人口急剧下降，从1939年的433万（是美国的1.76倍）下降到1946年的255万。二战后，尽管实行了“英雄母亲”政策，但是出生人数只略微回升到1951年的294万（只是1946年的1.15倍）。1955年之后，俄罗斯出生人口又开始下降，到1968年只有182万（比1955年减少38%）。而美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却从1933年的231万不断增加到1957年的431万（是1933年的1.87倍）。1961年之后，美国的出生人口也开始下降，跌到1973年314万的低谷，但仍然是俄罗斯的1.6倍。[SharonJayson,“Isthisthenextbabyboom?”USATODAY,7/17/2008,][“Table1-1.LiveBirths,BirthRates,andFertilityRates,byRace:UnitedStates,1909-

94，”Center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1946年到1971年美国生育率平均为3.14，俄罗斯为2.53。虽然苏联是在1991年解体的，其实二战期间就埋下了导致解体的人口学定时炸弹（人口有几十年的滞后性）。苏联在二战中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人口。美国才是二战的真正赢家。

图5美国、俄罗斯每年出生人数

2、苏联的寿命比美国短，尤其是男性寿命短，很多人在劳动年龄就过早死亡。

第二章 第十二节、苏联解体的人口因素

3、苏联在二战损失了两千多万人口，育龄人口损耗比例高，影响了今后的人口发展。从1950年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二战中俄罗斯育龄人口损耗程度远远超过日本。

4、俄罗斯堕胎比例很高。

表3美国、俄罗斯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岁）、堕胎率（%）比较

生育率 美国预期寿命 俄罗斯预期寿命 堕胎率

年份 美国 俄罗斯 男 女 男 女 美国 俄罗斯

1950-1955 2.85 3.45 65.8 71.7 60.5 67.3 0.01

1955-1960 2.82 3.71 66.6 73.0 62.5 69.9 0.01 134.9

1960-1965 2.55 3.31 66.8 73.6 64.1 72.8 0.01 198.4

1965-1970 2.02 2.55 66.8 74.1 63.8 73.4 0.2 268.6

1970-1975 2.03 2.02 67.5 75.2 63.1 73.6 17.3 239.4

1975-1980 1.94 1.79 69.4 77.0 61.9 73.1 39.1 216.5

1980-1985 2.04 1.80 70.7 77.9 61.5 72.9 43.1 189.2

1985-1990 2.12 1.89 71.3 78.4 63.9 73.8 40.9 190.0

1990-1995 1.55 1.99 72.2 79.0 60.6 72.7 37.5 226.2

1995-2000 1.25 1.96 73.4 79.4 59.6 72.2 34.2 193.6

堕胎率是指堕胎例数与同期出生孩子的比例。比如1970-1974年俄罗斯出生997万人，堕胎2386万例，堕胎率为；换句话说，怀孕100个孩子，其中有以堕胎而告终。美国是在1973年才将堕胎合法化，其后的堕胎率也不到俄罗斯的1/5。

5、美国有移民。

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和生态中心主任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俄罗斯的出生率就已降至临界点以下。但是有关人士用种种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口减少的真相暴露出来，但势头已无法扭转。[《俄人口减少趋势难以逆转》，人民网，2004年11月7日，]

其实美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开始快速下降，到1976年只有1.74，而俄罗斯的生育率却稳定在2.0。1972年到1989年俄罗斯的生育率一直高于美国，俄罗斯平均为2.0，美国为1.84。俄罗斯的出生人口从1968年的182万稳步增加到1987年的250万。但是孩子成为劳动力有20年的成长周期，远水不救近火。俄罗斯的20-59岁劳动力从1950年的5366万增加到1960年的6544万、1970年的6785万，然后在1985年达到8173万的顶峰后就开始减少，到1990年跌到低谷（8007万），国力也跌到低谷，导致苏联在1991年解体。如果当时能够熬几年，说不定还能熬过去，因为10年后俄罗斯劳动力开始大幅增加（从1999年的8066万增加到2010年的8774万）。

虽然1990年苏联人口仍然比美国稍微多一些，但是苏联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劳动人口不够，不足以支撑2.88亿人口的大国。可见无论人口多少，要是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都很容易崩溃。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人口因素只是其一。

前苏联解体后，一方面由于政治动荡，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稳定在低水平，俄罗斯经济负增长（1990-1998年人均GDP年均减少）；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从1985-1990年的69.11岁下降到1990-1995年的66.58岁、2000-2005年的64.88岁；生育率从1989年的2.01跳跃性下降到1995年的1.34、1999年的1.17；每年出生人口由1990年的199万下降到1999年的121万（只是1987年的49%）。

表 4 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历年的生育率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2，”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

te,]

第二章 第十二节、苏联解体的人口因素

?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3 1995 1999 2005 2009

俄罗斯 2.12 2.01 1.89 1.73 1.39 1.34 1.17 1.29 1.54

白俄罗斯 2.04 2.03 1.91 1.80 1.61 1.39 1.31 1.21 ?1.44

乌克兰 2.02 1.92 1.85 1.81 1.60 1.40 1.20 1.20 1.46

拉脱维亚 2.11 2.05 2.02 1.86 1.51 1.25 1.16 1.31 1.31

格鲁吉亚 2.24 2.22 2.18 2.13 2.01 1.88 1.66 1.57 1.56

立陶宛 2.09 1.98 2.03 1.97 1.67 1.55 1.46 1.27 1.55

保加利亚 1.97 1.90 1.81 1.65 1.45 1.23 1.23 1.32 1.57

捷克 1.94 1.87 1.89 1.86 1.67 1.28 1.13 1.28 1.49

斯洛伐克 2.13 2.07 2.09 2.05 1.87 1.52 1.33 1.25 1.41

匈牙利 1.79 1.78 1.84 1.86 1.69 1.57 1.28 1.31 1.32

罗马尼亚 2.31 2.20 1.84 1.57 1.44 1.34 1.30 1.32 1.38

波兰 2.13 2.08 2.04 2.05 1.85 1.61 1.37 1.24 1.40

塞尔维亚 ? ? ? 1.80 ? 1.70 ? 1.45 1.44

波斯尼亚 1.84 1.78 1.71 1.65 1.56 1.52 1.45 1.21 1.16

马其顿 2.17 2.15 2.13 2.10 2.03 1.94 1.72 1.50 1.44

斯洛文尼亚 1.63 1.52 1.46 1.42 1.33 1.29 1.21 1.26 1.53

克罗地亚 1.79 1.63 1.63 1.53 1.52 1.58 1.38 1.41 1.50

在苏联自身难保的同时，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劳动力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1990年左右就开始负增长；而当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仍然在快速增加。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85-1990年的2.11下降到1990-1995年的1.62、1995-2000年的1.29，2005-2010年也只回升到1.40。而美国、法国、英国的生育率在1985-1990年分别为1.89、1.80、1.84，在2005-2010年则分别为2.07、1.97、1.83。[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

中国2013年后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但从国际环境看应该不会出现前苏联那种政治危机，因为中国经济有完善的体系，并且早已与世界融为一体。根据世贸组织的资料，2010年中国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占日本的，占欧盟的。并且中国的市场也正在崛起，200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只占美国总出口的，但2010年已经增加到，中国市场正给美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2011,”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苏联、东欧当年是孤立的经济体系，还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现在中国不但不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今后老年化的中国更加无力威胁他国），而且是其重要贸易伙伴。如果中国出现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那么受害者不仅是中国，还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甚至可能引起整个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和政治动荡（日本和欧洲将首当其冲，因为劳动力已经负增长）。

第二章 第十三节、俄罗斯人口政策的教

1999年俄罗斯的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人均GDP在1999年到2010年平均年增，一是因为普京赶上了好运气，20-59岁的劳动力在1999年后开始回升，从1999年的8066万增加到2010年的8774万；二是因为普京采取有效措施，稳定了政治和经济局面；三是因为石油价格稳定在较高水平（俄罗斯是石油输出国）。凭着优良的政绩，普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2012年以64%的得票率第三次当选总统。但2010年之后俄罗斯20-59岁劳动力（由于俄罗斯寿命较短，因此劳动力不以15-64岁计算）开始不可逆减少（1991年后生育率跳跃性下降后，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25年将跌至7301万，普京2012年再任总统后可能会面临一些棘手问题，普京离任时的声望将大不如2012年。

图6俄罗斯历年劳动力和GDP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14年，俄罗斯有0.899亿人口，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49亿；然而从1992年至今，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高50%以上，总人口下降到2010年的1.43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果保持近年的生育率，俄罗斯的人口将下降到2100年的0.67亿。普京总统称之为"国家危机"，人口危机已成为威胁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头号敌人，将来俄罗斯的国家基础都会受到动摇。俄罗斯15-24岁人口将从2005年的2458万下降到2020年的1371万，这至少意味着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到那时将不复存在。

就政治意义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将使俄罗斯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发生变化。

从人口角度评价，普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他上台后俄罗斯生育率从1999年的1.17稳步回升到2006年的1.3、2009年的1.54、2010年的1.59，出生人口由1999年的121万增加到2011年的180万（增加48%）。而1999-2010年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生育率却仍然徘徊在1.3左右，台湾生育率从1.56下降到0.895。俄罗斯生育率回升有下面几个原因：

1、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增长，预期寿命提高到2011年的68岁。

2、政府认识到人口危机的严重性，俄罗斯正在走向死亡。普京在多次国情咨文中称人口减少问题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尖锐的问题”，是“国家危机”。[《低生育率已成全球性趋势》，《参考消息》2004年10月1日。]2005年俄罗斯推行“国家优先发展计划”，普京亲任主席。[韩显阳：《普京“三管齐下”解决人口问题》，新华网，2006年05月13日，]2006年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中重点谈论了两个“主要问题”，即人口问题和军队发展问题，普京把人口问题放在军事问题之前，可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人口问题俄罗斯的"心头之痛"》，人民网（来源：《广州日报》），2007年10月22日，]

3、普京的人口政策的核心是改变现有价值观，回归传统，重视家庭，树立养育子女光荣的观念（普京将“祖国服务”勋章授给“英雄母

亲”），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子女、进而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为了不偏废传统的家庭观念，俄将2008年定为“家庭年”；梅德韦杰夫总统上台后，又在其夫人的倡议下设立“家庭、爱情和忠诚日”。[陆乐，青木，萨苏，古放，陶短房，高懿洁，钟玉华：《男主内,女主外?全球家庭形态遭遇"非传统"挑战》，人民网（来源：《环球时报》），2010年05月07日，]

第二章 第十三节、俄罗斯人口政策的教

4、在政府和宗教力量的推动下，堕胎比例在稳步下降（从1993年的70%下降到2008年的45%）。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严格对堕胎广告的要求，广告内容必须警告堕胎可能成为不孕的原因。[《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严格对堕胎广告的要求》，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15日，]2011年11月21日俄罗斯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怀孕12周以后堕胎，并且还规定，申请堕胎的妇女在堕胎前必须有2-7天的重新思考时间。[Russiaparliamentadoptslawrestrictingabortions,CBSNews,October21,2011,]

5、财政补贴：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要求政府详细制定一个为期10年的庞大的由于鼓励生育的财政补贴计划，包括提高对新生儿家庭的补贴，发放儿童学前教育补贴，对孕妇、产妇进行补贴，鼓励并资助收养孤儿，设立“母亲资本”等。[《人口问题俄罗斯的"心头之痛"》，人民网（来源：《广州日报》），2007年10月22日，]2011年普京发表2010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俄政府将增加投

入，继续大力推行改善医疗、鼓励生育等刺激政策。[刘恺：《普京说俄罗斯将大力推进鼓励生育等刺激政策》，新华网，2011年04月21日，]2012年2月12日普京提出一系列详细计划，认为扩建公立幼儿园是俄罗斯领导层的首要工作；把人口负增长地区第三个和第三个以上子女出生的家庭的社会补助延长至孩子3岁，补助额度为每个月7000卢布(约合1470元人民币)；增加学生的奖学金（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将房地产价格降低20%至30%（降低民生成本）。普京表示，如果他的这些计划都能付诸实施，俄罗斯人口将在2050年上升至1.54亿，否则将下降至1.07亿。[朱艳：《普京列出详细计划欲将俄罗斯人口增至1.54亿》，新华网（来源：国际在线），2012年02月13日，]俄罗斯副总理罗格津则表示，俄罗斯应该通过鼓励生育将人口在现有1.42亿的基础上增加3倍，即要达到5亿人。[《俄副总理表示俄罗斯人口目标为5亿》，中国日报网（来源：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13日，]

6、吸引移民：尤其是欢迎前苏联地区的移民。俄罗斯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移民目标国家（移民人数仅次于美国）。移民的涌入补偿了自然损失的人口数量。普京表示，移民的不断涌入可以使俄罗斯人口在2025年达到1.46亿。[《俄罗斯人口数量因移民涌入而增加达到1.43亿》，新华网（来源：中国新闻网），2012年08月20日，]

第二章 第十四节、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1700年美国人口只有100万，只占全球的。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人口还只有250万。由于外来移民和高生育率，美国人口快速增加

到1820年的998万（占全球）、1900年的7639万（占全球）、1950年的1.52亿、2009年的3.07亿。

以 1990 年 的 国 际 元 计 算 ，[AngusMaddison,“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WorldEconomy:1-2008AD”,]1820年美国经济总量还只占全球的，只相当于英国的、法国的；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在1861年超过法国，在1872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1951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达到的顶峰，GDP占全球比例也达到的顶峰。其后，美国人口和GDP占全球比例都缓慢下降，2008年分别下降到、。

图7美国人口、GDP占全球比例

以现值美元计算，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在1962年达到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10年的。美国占全球500强企业的份额从2002年的197家减少到2012年的132家。

可见，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的变化与人口占全球比例是同步的。目前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仍然高于其人口占全球比例，原因是美国的工业化起步比中国、印度早一百多年，有先发优势。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中、低方案，[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 到2050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仍将分别为、，到2100年则将分别为、。

也就是说，今后上百年美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美国的先发优势逐渐丧失，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优势而崛起，这个时候决定国家实力的主要就靠人口了，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却将继续下降。

到2050年，美国人口仍将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中国由于老年化，经济总量难以超过美国。印度虽然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毕竟与美国差距太大，在2050年之前难以超过美国。

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强盛，与其生育率的变化密切相关。相对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来说，美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起步晚，生育率下降也晚。美国的生育率是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下降，到1900年的时候还在3.9左右（法国只有2.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德国、英国等都出现生育率的跳跃性下降，而美国的生育率的变化却较为平稳，即便最低谷的1936年也还有2.1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等国生育率再次跳跃性下降，而美国生育率反而在1940年开始回升（提前出现婴儿潮）。1960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3.65的，而欧盟（以2010年的27国为准）只有2.59。

20世纪60年代，美国、欧盟的生育率再次下降，美国下降更快，1975年只有1.77，而欧盟还有2.07。1981年美国的生育率为1.81，欧盟为1.82，基本一致。此后，美国的社会全面趋向保守，生育率止跌回升，1989年达到2.08，此后一直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由于生育率的回升，加上婴儿潮的出生高峰到了生育年龄，美国在1974年之后出现了又一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由1975年的314万增加到

1990年的416万（增加1/3），此后美国每年出生人口一直稳定在400万左右。["Livebirth,deaths,infantdeaths,andmaternaldeaths:1990to2001,",Statistical AbstractoftheUnitedStates:2003,p21-22.]
["Births,deaths,marriages,anddivorces,",StatisticalAbstractoftheUnitedStates:2012,://]

第二章 第十四节、美国崛起的人口因素

而欧盟却变得更加"自由"，生育率也继续下降到1989年的1.65、1999年的1.44，其后虽有所回升，但2009年仍然不到1.6。由于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婴儿潮的那个出生高峰并没有继发出另一个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在"平稳"地下降。

图8美国历年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

1950年美国人口为1.58亿，欧盟（27国）为3.73亿，是美国的2.4倍。2010年美国人口为3.1亿，欧盟为5.0亿，是美国的1.6倍；美国中位年龄为37岁，欧盟为41岁。根据《世界人口展望- 2010年修订版》，假如继续保持目前的生育率的话，207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4.38亿，超过欧盟的4.35亿；美国中位年龄只是41岁，欧盟却是50岁。210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4.78亿，是欧盟3.69亿人口的1.3倍。1960年美国、欧盟老年抚养比均为；2010年美国为，而欧盟却为；2050年美国为35%，而欧盟为51%；2100年美国为46%，而欧盟为65%。

由于移民以及拉美裔和非洲裔的生育率高于白人，美国白人占全国比例从1940年的下降到1980年的、2010年的。种族结构的变化也改变了政治版图。2008年、2012年非洲裔的奥巴马两次当选美国总统，很大程度得益于少数民族一面倒的支持。2008年他在白人男性选民中只获得41%的支持（这也反映出美国的进步，因为在40年前是不可能的），而他的对手麦凯恩却获得57%的支持。[GaryLanger,“RomneyTakesLeadonEconomy;WhiteMenaretheMovers,“ABCnews,Oct24,2012,]2012年总统选举，白人中39%支持民主党的奥巴马，59%支持共和党的罗姆尼；非洲裔（占选民的13%）中93%支持奥巴马，6%支持罗姆尼；拉美裔（占选民的10%）中71%支持奥巴马，27%支持罗姆尼；亚裔（占选民的3%）中73%支持奥巴马，26%支持罗姆尼。[“2012PresidentialElectionExitPolls,”CNN,Nov15,2012,]随着民族融合，选票的民族特色将不断淡化。美国是移民国家，其民族融合是今后全球化的缩影。美国的一些民族政策值得各国借鉴。

两次出生高峰奠定了美国强国的地位。但是由于经济衰退等原因，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的生育率已经由2007年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1988年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的1.89，2011年的育龄妇女出生率为1920年有记录以来最低，[BradyE.Hamilton,JoyceA.MartinandStephanieJ.Ventura,“Births:PreliminaryDatafor2011,”NationalVitalStatisticsReports,Vol.61,No.5（Oct.3,2012）,]让美国很多学者感到很震惊。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2010年可能是美国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从人口结构看，美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可能性很大：①美国的总抚养比在2005年开始上升，从49%上升到2030年64%（是因为老年抚养比从18%上升到34%），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很难完全恢复，老年福利将压制儿童福利。②少数民族人数的增

加，使得自由派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拉美裔、黑人的生育率也在下降，下降速度比白人更快，比如2007-2010年美国出生率整体下降8%，而墨西哥移民则下降24%[“USbirthratefallstorecordlow,”BBCnews,29November2012,]），保守派共和党复兴传统文化的企图将很难实现（2008年、2012年共和党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在往中间路线靠），美国可能将一步步往欧洲的道路上滑。美国需要调整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努力防止生育率下降。

第三章 第一节、二战前：从种族主义、

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世纪以来生育率就不断下降，比如美国的生育率从1850年的5.7几乎直线下降到1900年的3.8。而法国生育率在1901年的时候更是只有2.9了。尽管当时美国等国还是禁止避孕和堕胎的，避孕器具也很昂贵（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相继研制成功口服避孕药和高效的宫内避孕环），但中上层私下避孕已经很普遍。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国、挪威、丹麦的生育率只有2.2左右，而英国、德国、瑞典、瑞士等国的生育率更是低于2.0了；而当时发达国家由于婴幼儿死亡率仍较高，世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普遍在2.3以上。[JanVanBavel,“SubreplacementFertilityintheWestbeforetheBabyBoom(1900–1940):CurrentandContemporaryPerspectives,”InterfaceDemography,September1,2008.]也就是说，当时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并不存在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

但是发达国家的“低素质”的穷人（尤其是黑人等有色人种）由于识字率低，没有避孕知识，也买不起避孕器具，生育率远远比“高素质”的富人要高，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黑人生育率还在3.0左右（说明当时黑人避孕也非常普遍了）。[MicheleBoldrin,MariacristinaDeNardi,LarryE.Jones,"FertilityandSocialSecurity,"NBERWorkingPapers11146,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Inc.2005，]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Sanger，1879-1966）是计划生育的首倡者。桑格是家中十一个孩子的第六个，她的母亲共怀孕过十八次，去世的时候不到五十岁（其实在当时还算正常的）。桑格一直相信她母亲的死和痛苦，与过多怀孕和生育有关。桑格曾在纽约市的移民社区当过护士，看到许多贫穷移民妇女因不断的生育而无法摆脱贫穷，于是她于1912年倡导计划生育，1914年印发杂志宣传避孕，1916年开设计划生育门诊部，桑格的活动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她也几次被捕入狱。几年后她的境况大为改善（她应该得到了富人的资助，才能周游各国）。1921年她创立了美国限制生育联盟，1922年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限制生育大会。

桑格是女权主义者，她提倡节育应该是为了贫穷妇女权益；但她又反对给穷人提供福利，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其实她控制人口更主要是出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考虑，她在1919年就提出“节育（birthcontrol）的“首要目的”就是让社会有更少的‘劣等人’（unfit），有更多的‘优等人’（fit）的人”。1921年她提出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纯化种族”。她认为黑人应该被消除，黑人、穷人、穷移民等“不合格”的人是“人类的杂草”、“不应该出生的人”，

[AngelaFranks,MargaretSanger'sEugenicLegacy:TheControlofFemaleFertility,Jefferson,:McFarlandandCo.,2005.] [MaryMeehan,"TheRoadtoAbortion,"HumanLifeReview24,no.4(Fall1998),76-89,and25,no.1(Winter1999),68-82.Anupdatedversionisavailableon"HowEugenicsandPopulationControlLedtoAbortion."]1922年桑格提议强制性地对下层百姓进行智商测试和节育。一方面她认为人类的生育不应由男人（她说“不管男人的态度如何”）和政府、国家决定，而应由女性决定。另一方面，她又建议政府干预生育，实行准生证制度，只有合格的人群才能获得政府颁发的准生证。[DavidKennedy,BirthControlinAmerica:theCareerofMargaretSanger，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0,]桑格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西方国家很多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支持。

第三章 第一节、二战前：从种族主义、

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内部，白人的经济地位也比有色人种要高，白人产生了一种种族优越感。穷人和有色人种以及贫穷国家整体的高生育率引起优生学家和种族主义者的担忧，担心会出现“逆淘汰”。

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他的表弟高尔顿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并倡导了优生学。1912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召开，达尔文的儿子主持了这次会议。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美国家开始广泛流行。

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亨利·奥斯本（HenryFairfieldOsborn，1857-1935，铁路大亨威廉·奥斯本的儿子）是大会主席。在他和其他人的推动下，美国于1926年成立了美国优生学会。桑格（1922年离婚后，43岁的桑格嫁给了61岁的石油大王詹姆斯·斯利）和美国很多富人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早期成员。该组织在亨利·奥斯本的领导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改良种族，手段之一就是控制人口。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对优生学的热情非常高涨。1932年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名誉副主席亨利·奥斯本在会上致辞说：“优生学不是人类的发明，是众所周知的普适价值，即优等人生存下来，劣等人被消灭（elimination）。”他认为人口过多，超出的土地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大量劣等人永久性失业。光是美国就有数百万劣等人在拖美国的后腿。他认为节育（birthcontrol）运动是双面剑，虽然初衷是控制劣等人的生育，但事实上对优等人的影响更大，比如法国上层人生育率更低。因此他提出用生育选择（birthselection）取代birthcontrol，鼓励优等人多生，抑制劣等人生育。这篇致辞发表在该年8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上。[HenryFairfieldOsborn,“Birthselectionversusbirthcontrol,”Sciencevol.76no.1965(26August1932),pp.173-179.]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建议，对有劣等基因的人群进行隔离、结扎、节育、堕胎、杀婴，以防止他们繁衍下去而稀释美国的基因库。[DavidCReardon,“ChapterFive:1932-1982:EugenicsinTransition,”TheEugenicsConnection:ShapersofHumanity,] 1932年桑格女士建议对精神和道德有缺陷的人进行隔离和绝育；也可

将第二组人群（文盲、贫民等）隔离到农场和开放地带。德国优生组织对美国优生学会推崇有加，希特勒本人还给美国优生学会主席麦迪逊·格兰特写过感谢信，认为美国优生学会关于种族的书是他的圣经。[MaryMeehan,"TheRoadtoAbortion,"HumanLifeReview24,no.4(Fall1998),76-89,and25,no.1(Winter1999),68-82.Anupdatedversionisavailableon"HowEugenicsandPopulationControlLedtoAbortion."]

对美国优生学及其后的人口学支持力度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和奥斯本家族。洛克菲勒一世（石油大亨老约翰·洛克菲勒，地球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二世、洛克菲勒三世（JohnD.Rockefeller3rd，1906–1978）都是美国优生学会的会员。他们认为只有他们和与他们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FrederickWilliamEngdahl(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洛克菲勒一世还给德国的几个优生学组织提供了巨额资助，而这些组织成为希特勒的纳粹优生项目的重要基地。亨利·奥斯本的儿子亨利·奥斯本二世（HenryFairfieldOsbornJr，1887-1969）、侄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FrederickHenryOsborn，1889-1981）也是美国优生学会的创始会员或早期成员。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与洛克菲勒三世一起成为优生学的新旗手和人口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在1937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秘书的时候，将纳粹的优生学赞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试验”。[FrederickOsborn,“'SummaryoftheProceedings'oftheConferenceonEugenicsinRelationtoNursing,”AmericanEugenicsSocietyPapers,BK6,Feb.24,1937.]

第三章 第一节、二战前：从种族主义、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给优生学以巨大的打击。很多中上层人士以前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哪些人是劣等人群；现在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失业和贫困，那么是否也被认为是劣等人群？[DanielTaylor,“EugenicsandEnvironmentalism:Fromqualitycontroltoquantitycontrol”,Old-ThinkerNews,April30,2008,]洛克菲勒三世和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在帮助优生学渡过财政难关的同时，也意识到单独设立人口学的必要（用马尔萨斯主义取代优生学，并且控制人口也确实到了需要“科学”量化的阶段）。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和校董，也是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的董事，在他的游说之下，1936年米尔班克纪念基金资助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世界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TheOfficeofPopulationResearch,fromThePrincetonCompanion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邀请他的朋友弗兰克·W·诺特斯坦（FrankWallaceNotestein，1902–1983）担任所长，成为现代人口学的主要创立者。

诺特斯坦在192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成员。1929年他加入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研究不同生育率的遗传学影响，他认为，生育率的不同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种群构成。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官方网站仍然不讳言他的这些优生和种族主义的

背景。["FrankW.NotesteinPapers,1930-1977:FindingAid",PrincetonUniversityLibrary,PublishedinPublishedonNovember28,://:/88435/m326m1736]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属于国际事务学院，可见其重点是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二战后，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一一曝光，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之后，变成了人口学、环境学。1966年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对记者说："以人口理事会的名义开发宫内节育器（IUDs）比以优生学的名义更好。我认为IUDs是迄今最重要的优生手段"。[FrederickOsborntoP.R.U.Stratton,12Jan.1966,AESArchives,folderon"Osborn,Frederick,LettersonEugenics."]1968年他在书中说："用其他的名目达到优生的目的"。[FrederickOsborn,TheFutureofHumanHeredity，NewYork：WeybrightandTalley，1968,]

桑格和洛克菲勒家族、奥斯本家族在穷人、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宣传计划生育，但桑格本人有三个孩子，她最钟爱的小儿子生了6个孩子。洛克菲勒一世有5个孩子（到2006年为止，他有150多个后代了），洛克菲勒二世有6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四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的大弟有7个孩子，二弟有4个孩子，小弟有6个孩子。亨利·奥斯本有5个孩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有6个孩子。老布什（也是优生学的信徒）有5个孩子。可见他们确实是信奉birthselection。而他们培训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学家们却很少有多生孩子的（真将birthcontrol这一泥菩萨当成神来供），便于回国后"言传身教"。

第三章 第二节、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着手设计战后的世界格局了。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美国外交委员会完成了“美国战时与和平时期利益研究”的系列秘密报告。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在秘密报告中指出，贫穷国家人口增长很快，将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不利于美国拓展市场。诺特斯坦提出应该帮助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降低其生育率。[FrankW.Notestein,"ProblemsofPolicyTowardAreasofHeavyPopulationPressure,"No.T-B72,21April1944,6&11,in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StudiesofAmericanInterestsintheWarandthePeace(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1944).]诺特斯坦的报告对决策者和其他人口学家影响非常大。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Viner）也在秘密报告中指出，降低穷国的生育率符合美国利益。[JacobViner,"TheUnitedStatesandthe'ColonialProblem,'"No.E-B71,24June1944,10-11,in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StudiesofAmericanInterestsintheWarandthePeace(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1944).]这些建议很符合参与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那些商人们的口味。他们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国控制人口的计划必须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比如减少贫困、饥荒，提高妇女地位），以掩盖其真实目的：优生（降低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生育率），获取穷国的自然资源。“少生快富”可以避免穷国倒向苏共阵营。[MaryMeehan,"TheRoadtoAbortion,"HumanLifeReview24,no.4(Fall1998),76-89,and25,no.1(Winter1999),68-

82.Anupdatedversionisavailableon"HowEugenicsandPopulationControlLedtoAbortion."]

“在冷战环境中的敌对状况下，经济动荡和落后国家的贫困都被视为潜在威胁。此外，国家之间的收入高度不平等也被视作国际动荡的根源。再者，从长远角度看，低生育率区和高生育率区之间人口规摸失衡不断加剧将有让人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GraziellaCaselli,JacquesVallin,GuillaumeWunsch,Demography:AnalysisandSynthesis,FourVolumeSet:ATreatiseinPopulation1-4,NewYork:AcademicPress,2005,p34.]

可见，发达国家要控制穷国人口，既有长期考虑，又有短期打算。从短期看，为了防止穷国因为贫困和动荡而倒向苏联，就必须帮助其发展经济，比如美国在降低其盟友日本、巴西、台湾、韩国等生育率的同时，也让其经济快速发展；从长远看，又可以防止这些穷国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出现“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在策略上与满清控制蒙古的人口差不多：既提高了喇嘛的地位，又控制了人口。

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1980年获得美国田纳西大学博士学位）告诉笔者，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雅尔塔会议还有一个绝密协议，就是减少中国的人口，避免“黄祸”。涂肇庆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老教授私下里告诉过他。这种说法可信度较高，因为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西德总理阿登纳秘密会谈中也说，对欧洲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中国人口太多，发展起来不得了，那样就

会发生“黄祸”。他要阿登纳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付中国。[宫力，周敬青，张曙：《中苏论战毛泽东赞邓小平：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人民网-读书频道（来源：《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2012年04月27日，]

第三章 第二节、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

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RoadtoSurvival）和《我们被掠夺的星球》（OurPlunderedPlanet），推动了战后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也鼓舞了保罗·埃利希（1968年出版《人口爆炸》）等人。前者的作者是威廉·福格特，后者的作者是亨利·奥斯本二世。环境、资源（奥斯本二世重点强调了石油）成为控制人口的重要借口。奥斯本二世在该书以及其后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在194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认为人口过多比原子弹的危害还要大，呼吁制定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政策以限制全球人口增长。1953年他出版了《地球的极限》，书中的观点成为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的中心思想。奥斯本二世其实认识到“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他的这一观点被其后的环境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DonaldGibson,Environmentalism:IdeologyandPower,NewYork:NovaSciencePubInc,2003,]

1952年优生学家们成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人口控制，一个是由桑格女士和卡洛斯·布莱克（英国优生学会会长）等人在印度成立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一个是由洛克菲勒三世与弗雷德里克·奥斯本（1946-1952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会长）创立的

人口理事会（ThePopulationCouncil）。人口理事会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是各国人口学的摇篮。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被洛克菲勒三世任命为人口理事会的会长。他有超强的鼓动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他1941年担任美国陆军部士气署的主席，战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副代表，后在联合国常规军备委员会任职一年。在奥斯本的领导下，人口理事会重点是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控制人口。为了避免指责美国为帝国主义，奥斯本要求人口理事会保持非常低调。比如在1952年创建人口理事会的会议上，奥斯本曾经问道："假如开发一种完美的避孕措施，那么应该由芝加哥大学或者或Bellevue医院等（学术机构）来宣布，并且在日本或印度（发展中国家）开发完成，这样不是效果更好吗？"人口理事会资金雄厚，通过提供巨额研究基金和丰厚的奖学金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人口专家网络。奥斯本说通过这种静悄悄的"学术"方式，可以避免穷国的公众意识到是美国在控制其人口。[BerylSuitters,"BeBraveandAngry:ChroniclesoftheInternationalPlannedParenthoodFederation(London:IPPF,1973),"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transcriptof"ConferenceonPopulationProblems,"Williamsburg,Va.,21June1952,afternoonsession,16,RAC;andFrederickOsborn,VoyagetoaNewWorld,1889-1979(Garrison,:privatelyprinted,1979),133.]人口理事会的人口专家遍布亚（包括中国）、非、拉。[PopulationCouncil.]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PaulDemeny）公开承认：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其管理人员（如计划生育官员）和

专业人员（比如人口学家）会自发性地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会一直主动地继续控制人口计划。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生育的所谓“持续发展”的理由会渐趋式微。这部分是源于大众对计划生育的内在科学性的批判，更主要的是人们对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的自然反应。[PaulGeorgeDemeny,“PopulationPolicy:AConciseSummary,”PopulationCouncil,Volume173ofWorkingpapers,2003,]

第三章 第二节、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

可见，保罗.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计划生育官僚机构一旦设立，将会自我巩固和强化，不断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为了自己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不择手段（比如数据篡改）。保罗·德曼也知道所谓的“计划生育有利于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幌子，迟早会被揭穿。

1959年诺特斯坦接替奥斯本成为人口理事会的主席（1968年卸任）。人口理事会从1950年代开始将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岛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根据这个岛国的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这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

妈们做绝育手术，结扎输卵管。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FrederickWilliamEngdahl(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人口理事会也将芝加哥的黑人贫民区作为他们的控制人口的“实验室”，然后将所积累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1961年一个实验主管向诺特斯坦汇报说：“所有的黑人、低收入群体都在服用我们的口服避孕药，现在都快疯了”。通过舆论灌输让民众“自愿”控制人口也是其重要手段。他们也实验如何在实行控制人口的计划时，避免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EdmundRamsden,“BetweenQualityandQuantity:EugenicsandtheEvolutionofAmericanDemographyasaScientificDiscipline,1927-1972”,PhDdiss.,EuropeanUniversityInstitute,2002.][JurriaanMaessen,“RockefellerCouncilDemographersSubjectedAmericanSlumsToEugenicMind-ControlOps”,,July2,2012,]

1968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匹兹堡分部曾指供：为低收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避孕药及其它避孕方法的计划生育诊所一直在尽量降低美国黑人的出生率，避孕品被当成灭绝种族的凶器。“黑人种族灭绝”一词流行起来。[SimoneMCaron,“BirthControlandtheBlackCommunityinthe1960s:GenocideorPowerPolitics?“JournalofSocialHistory,Vol.31,No.3(Spring,1998),pp.545-569.]

在穷国推行计划生育的路线图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先由学术界进行研究，然后形成大众舆论，最后通过国际和国家层面研究经济发展的机构形成控制人口的官方政策。”[GraziellaCaselli,JacquesVallin,GuillaumeWunsch,Demography:AnalysisandSynthesis,FourVolumeSet:ATreatiseinPopulation1-4,NewYork:AcademicPress,2005,p34.]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他在书中认为：人口爆炸导致环境污染，死亡率将增高，寿命将大幅缩短。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RichardA.Posner,PublicIntellectuals:AStudyofDeclin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埃利希呼吁道，人口增长必须停止，“如果靠自觉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就采取强迫手段。”[LeoHickman,“Thepopulationexplosion,”TheGuardian,13January2011,]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成立了罗马俱乐部。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无限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各卖出了数百万本，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出控制人口的政策。

第三章 第三节、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角色

1945年洛克菲勒家族拿出巨资在纽约买下了一块土地，捐给了新成立的联合国。联合国从此在洛克菲勒家族控制全球人口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46年10月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设立了人口委员会。同年，诺特斯坦在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了一个职能部门——联合国人口处，并成为首任处长（1946-1948年）。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洛克菲勒说：“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FrederickWilliamEngdahl(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促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在人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1967年秘书长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1969年定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同年联合国人口处也升级为人口司。

在洛克菲勒三世的推荐下，菲律宾人拉斐尔.萨拉斯（RafaelSalas，哈佛大学毕业）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首任执行主任，并一直干到他1987年去世。萨拉斯被洛克菲勒三世选中有下面几个重要原因：[JeanGuilfoyle,"NSSM2000:blueprintfordepopulation,"TheInterim,July1998,]
["FormerUNFPAExecutiveDirector,UNUnder-SecretaryGeneralRafaelMontinolaSalas,"UNFPA,]

1、萨拉斯与洛克菲勒三世有极深的渊源，曾被洛克菲勒三世推荐担任负责菲律宾人口控制计划的联合国人口项目高级官员。

2、1968年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人权会议上，萨拉斯被选为大会副主席。《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有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的基本人权。"由萨拉斯出任联合国人口基金主任，既可以在人权方面掩人耳目（萨拉斯被选为人权会议的副主席本身可能就是预埋伏笔），还可以以"人权"为名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比如"提高"妇女地位）。根据人权宣言，父母可以决定是否要生下孩子或堕胎，等于是将胎儿的生命权从属于母亲或父母的自由选择权。依照这种定义，中国老百姓"自主地"通过B超选择性堕胎女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事实上，萨拉斯根本就无视人权问题，比如1984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的时候，萨拉斯对记者说"人权问题应由各国自行决定"。[FredPearce,TheComingPopulationCrashandourPlanet'sSurprisingFuture,Boston:BeaconPress,2010,P81.]

3、萨拉斯的肤色（亚洲人）和信仰（天主教）。因为当时亚洲人口增长很快，而洛克菲勒三世控制全球人口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天主教。

4、“lookatusandlearn”（言传身教）和conviction（信念）。因为萨拉斯曾在菲律宾政府担任负责粮食的官员，有强烈的控制人口的信念，符合洛克菲勒用“粮食危机”控制人口的理念。

后面三任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也都符合“言传身教”和“信念”的原则。第二任（1987-2000年）执行主任是巴基斯坦的纳菲丝·萨迪克（NafisSadik）女士（是桑格奖的获得者，1971年加入联合国人口基金之前曾是巴基斯坦负责人口控制的官员）。萨迪克在印度出生、读大学，在巴基斯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对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妇女（劳动参与率很低、识字率很低，人口增长很快）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她又是名门之后（她父亲是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世界银行副总裁），有号召能力。萨迪克也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旗下的穆斯林妇女基金的顾问。[MuslimWomen’sFund.]洛克菲勒家族公开承认是想通过支持女权主义、“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动摇家庭结构，进而减少生育、控制人口，以实现“全球精英”化。[PaulJosephWatson,”RockefellerAdmittedEliteGoalOfMicrochippedPopulation,”PrisonPlanet,January29,2007,]

第三章 第三节、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角色

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三任（2000-2010年）执行主任苏拉亚·欧拜德（ThorayaAhmedObaid）女士，是首位接受政府奖学金到美国留学的沙特女性，也是首位出任联合国部门高官的沙特女性，只有2个女儿。通过她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将中东地区的高生育率降下来。欧拜德女士也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纽约大学研究西方与穆斯林关系的中心的顾问委员。[CenterforDialogues:IslamicWorld-://]

联合国人口基金现任（2010-）执行主任巴巴通德·奥索蒂梅欣(BabatundeOsotimehin)曾是尼日利亚卫生部长。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到哈佛大学进修人口学。根据他的简历，1981年以来他因为避孕等方面的研究多次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的资助。[BabatundeOsotimehinCURRICULUMVITAE,]现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其中尼日利亚为世界第七人口大国（2012年人口有1.6亿），生育率仍较高，经济发展也较快（2003-2011年GDP年均增长；以2005年可比购买力平价为标准，2011年的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国1997年的水平），预计到2035年将成为仅次于印度、中国、美国的第四人口大国，成为非洲强国；今后人口还将超过美国。由奥索蒂梅欣出任UNFPA执行主任将有助于降低非洲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以“可持续发展”为由，敦促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比如2012年8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警告称，如果菲律宾不能通过控制生育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向国民提供免费避孕工具），它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可能倒退。[“UNwarnsonPhilippinesbirthlaw，”RadioAustralia,Updated5August2012,]联合国还特意将全球第70亿人“诞生”在菲律宾。

但是经济学家的结论却截然相反，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诺伊曼（FredericNeumann）表示，未来几年，亚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菲律宾则将会因为拥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而保持竞争优势。汇丰银行预测，菲律宾的经济在世界排名将从2012年的第44位跃升到2050年的第16位。[FloydWhaley,“AYouthfulPopulaceHelpsMakethePhilippinesanEconomicBrightSpotinAsia,”TheNewYorkTimes,August27,2012,]

联合国的那些堂皇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人均资源丰富的津巴布韦在人口政策上是“听话”的国家，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资助其普及避孕和提高妇女教育水平；而尼日利亚是“不听话”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0》，津巴布韦的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从1979年的快速攀升到1987年的40%；而尼日利亚却从1979年的只缓慢地上升到1987年的23%、2005年的31%。1990-2008年津巴布韦的育龄妇女避孕率高达，而尼日利亚只有。津巴布韦的生育率从1980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3.3，而同期尼日利亚的生育率只从6.8下降到5.5。但津巴布韦并没有“少生快富”，人均GDP从1980年的$916下降到2010年的$594；而尼日利亚反而是“越生越富”，人均GDP从$850增加到$1222。

津巴布韦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尼日利亚的42%，但今后人口将不到尼日利亚的1/20，无法像尼日利亚那样形成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经济前景将远不如尼日利亚。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坚决支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育儿，都对妇女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再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避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自发地提高教育水平和避孕率（就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可能比拔苗助长地（甚至通过诱骗、强迫手段推行节育）提高更符合经济规律。

第三章 第四节、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

二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廉价的资源进口。欧盟对进口石油依赖度超过90%，美国的石油消费也很大程度依赖进口，但当时预测世界石油储量很快就要枯竭。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一方面是认为全球资源即将耗竭。人口悲观论甚嚣尘上。

1969年7月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主席。1972年约翰三世把他的减少人口的实验和报告呈交给总统。在大选之年尼克松决定低调处理这份报告。然而，这一报告的政策建议得到了高度重视。

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由1973年的每桶3.29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1.6美元，最终引发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失业率剧增，经济负增长。美国GDP增长率由1973年的下降到1974年的、1975年的，欧盟的GDP增长率也从

1973 年 的 下 降 到 1975 年 的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 ”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石油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对全球资源和人口的担忧。

1974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上，美国提出了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降低世界人口数量的建议。这一计划受到了天主教教会、除罗马尼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坚决抵制。它们的抵制使美国的决策层意识到实施这个计划需要用一些隐蔽的手段。[FrederickWilliamEngdahl(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在这个背景下，亨利·基辛格（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被授权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简称《NSSM-200》。1974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SM-200》。[NationalSecurityStudyMemorandum200(NSSM200)-April1974.]基辛格认为：“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应该成为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

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杰拉德·福特接替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为副总统。纳尔逊的老朋友基辛格仍担任国务卿。至此美国进入了推行控制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期。福特一上任就立即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

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BrianClowes,KissingerReport2004:ARetrospectiveonNSSM-200,HumanLifeInternationa,2004,]

《NSSM-200》的中心思想：世界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应确保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无阻地获取自然资源。

为了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NSSM-200》中列举了多种可能阻碍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地获取资源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第三章 第四节、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

1、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加，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2、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将难以购买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这样会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3、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会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从而有人数众多的反帝国主义的年轻人口。

因此，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

地缘政治也是美国政要们的重要考虑。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出现了婴儿潮，1956-1961年美国生育率更是维持在3.7的高水平。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生育率开始再次下降，美国在1974年只有1.84（其中白人为1.75，黑人为2.34），英国也只有1.92。而当时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仍然在5.0以上，死亡率却开始快速下降。世界人口由1913年的17.9亿增加到1950年的25亿、1974年40亿。但西方国家（西欧30国以及美国、加拿大、大洋洲）的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13年就开始减少，从下降到1950年的、1974年的。1960年到1974年全球增加人口中西方国家只占。[AngusMaddison’swebsite:

7]

美国的一些政要担心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为强国，从而对美国构成威胁。比如基辛格在《NSSM-200》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的特殊地位："它在人口方面明显主导着（南美）大陆"，按以前的预测其人口到2000年就将赶上美国。《NSSM-200》警告说，巴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意味着"在今后25年内巴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舞台上的势力和地位将日益上升。"

《NSSM-200》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比如：

1、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2、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3、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不惜用强制手段。

4、降低生育意愿。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

5、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

1）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关爱女孩”）；

2）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

3）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

按照1948年联合国宪章的严格定义，这种政策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基辛格自然明白，如果这一计划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就会被扣上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甚至更难听的帽子。他耍了一系列宣传花招以掩盖真实意图，在《NSSM-200》里说：

“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1）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2）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进一步，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三章 第四节、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美国的计划被包装成“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与1968年《德黑兰人权宣言》非常吻合了，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现在成了“自由选择”、“可持续发展”了、“保护妇女权益”了。

《NSSM-200》还特别指出，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也应该包括红十字会，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曾在红十字会工作，熟悉其运作模式；中国计生委主任、副主任退职后也到红十字会任职）来实施这项计划，并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福特基金会等很多美国基金会和个人都热衷于资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现在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了。2009年0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文章《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有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在纽约的绝密聚会，其中包括大卫·洛克菲勒、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这个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延缓全球人口增长。[RobertFrank:《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华尔街日报》，2009年05月28日，]

据估算，1965年到2004年美国共投入了173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主要投入到美国国际开发署；其次是投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BrianClowes,KissingerReport2004:ARetrospectiveonNSSM-200,HumanLifeInternationa,2004,]

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了15年，直到与天主教教会有关联的一些组织采取私人法律行动，最终才迫使这份文件在1989年解密。1990年代才供一些学者进行研究。

1964-1985年统治巴西二十年的军事独裁政权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这段时间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生育率急剧下降。1991年，《巴西杂志》等媒体披露了《NSSM-200》后，巴西卫生部进行了调查。

这次调查是由来自巴西立法机构各个政党的165位议员发起。巴西政府震惊地发现约44%、年龄在14~55岁之间的巴西妇女已经永久性绝育。大多数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1970年代中期该计划刚启动时就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巴西政府发现绝育手术由形形色色的机构实施，其中有一些是巴西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国际计划生育联盟、美国开拓者基金会、自愿外科避孕手术联合会和国际家庭健康组织。所有计划都是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支持和指导下实施的。巴西政府提出了抗议。[FrederickWilliamEngdahl(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秘鲁面积128万平方公里，人口才两千多万，人均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藤森于1990年当选秘鲁总统后，也实行控制人口计划，25万妇女被“自愿”绝育。一些贫穷妇女为了获得免费粮食而被绝育，一些享受政府救济的妇女被威胁将取消救济而去接受绝育手术，一些妇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绝育。2002年秘鲁国会调查发现，藤森总统的计划生育是受美国国际发展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的，尤其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主导。[BrianClowes,KissingerReport2004:ARetrospectiveonNSSM-200,HumanLifeInternationa,2004,]

第三章 第四节、美国《国家安全研究备

联合国人口基金等组织也参与了泰国和伊朗的控制人口计划。2008年伊朗《德黑兰时报》披露了美国《NSSM-200》[古力：《美曾

制定秘密计划欲通过粮食控制欠发达国家人口》，中国新闻网，2008年03月22日，]

印度作为人口大国，自然受到格外的“礼遇”。桑格女士多次访问印度，1952年并选择在印度成立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比在发达国家成立象征意义更大）。1955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向印度卫生部提出人口政策的建议，印度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人口研究中心,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成为培养发展中国家人口学家的基地（蒋正华、李建民等人就是在那里学习的）。[“FrankW.NotesteinPapers,1930-1977:FindingAid”,PrincetonUniversityLibrary,PublishedinPublishedonNovember28,://:/88435/m326m1736]联合国人口基金给印度提供了巨额援助，光是1974-1979年的第一周期的项目就高达4000万美元。[“AssistancetotheGovernmentofIndia,”GoverningCouncilofthe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DP/FPA/PROJECTS/REC/24,10April1985.]1976年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进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一些员工如果不接受结扎将失去工作，印度绝育人数从1974-1975年度的135万升至1976-1977年度的820万。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1977年1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绝育人数也下降到1977-1978年度的90万。[“ThefateofRukminiPrasad,”NewInternationalist,1980Jun;88:20-1.]此后，历届政府都不敢轻易再碰这个敏感的问题，以免重蹈英迪拉.甘地的覆辙。[江亚平：《印度控制人口任重道远》，新华网，2004年5月2日，]虽然联合国人口基金仍然在设法控制印度的人口，迄今在印度共进行了七个周期的援助项目，但由于没有获得印度中央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印度生育率只是缓慢下降，目前仍稍高于更替水平。由于有

年轻的人口结构，印度经济充满活力。换句话说，印度被灌了一口毒药，但吐了出来。

美国现在仍然在致力于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比如，2010年1月8日国务卿希拉里在联大纪念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十五周年会议上发言，宣布美国2010年再次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基金，国会批准了6.48亿美元的对外援助，用于计划生育方案。希拉里还表示，美国启动了一个为期六年的新的项目，花费630亿美元巨资（相当于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年的预算）用来改善全球健康（包括普及避孕），预计可以防止数百万的意外怀孕。[HillaryRodhamClinton，“Remarksonthe15thAnniversaryof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PopulationandDevelopment”，,January8,2010，]当然，普及避孕后，必将减少更多（数量级的差别）的原本是“非意外”的怀孕。

第三章 第五节、计划生育思潮西风东渐

从战国的韩非子到清朝的汪士铎，中国本土支持控制人口者不乏其人。但第一个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的应该算是严复，而率先引入现代“计划生育”理念并引起知识界广泛讨论的人应该是胡适和张竞生。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

文的进化论观点。他曾提出“奢民说”和“教育妨生说”，也就是生活越富裕，教育水平越高，人口增长越慢。他主张用“奢民”和提高教育来减缓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陈文联：《近代中国“生育节制”思潮的历史考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3卷第2期。]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胡适受桑格夫人思想的影响，自称“无后主义”，疑问“为什么要孩子”？反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论”。1916年11月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的：“生育当裁制，家庭要自由。”[张家俊：《胡适首倡“计划生育”》，光明网（来源：《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第200期），2005年4月3日，]1920年他的好朋友任叔永与陈衡哲结婚时，胡适送去了一副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1922年桑格夫人因出席伦敦“国际限制生育大会”，而途经日本和中国。桑格夫人在日本并不受欢迎，讲演了15次，其中14次是在私人集会上讲的，唯一一次在公众集会上讲演，还受到了官方的阻扰。桑格4月中旬抵达北京。她持有当时正在美国考察的蒋梦麟（北大总务长、后任北大校长）写的介绍信，找到了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4月15日胡适到北京饭店拜会了她，安排桑格夫人于4月19日在北大大礼堂演讲，由蔡元培校长亲自主持，张竞生作陪。全场“听者约二千人”，胡适亲自担任翻译。桑格夫人除了宣传节育外，还介绍了她的优生学观点，“自然界中本来生存竞争的一种现象，则强者侵者自能生存，而弱者劣者便应淘汰。现在养成了一种假仁假义的慈悲心理，便不配生存也生存，不当繁殖者也居然繁殖”，她认为应该“使配生育的人才能生育，而且应有一种严格的裁制”。她在总结发言时对北大学子说：“我希望诸君坦白的老实的研究这个问题，帮助人类造成国际间永

久可靠的和平。”她的宣传册第二天就被译成中文，并且印刷了5000份公开发行。在胡适的倡议下，“中华生育制裁协会”在北京成立，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计划生育组织。[乔晓轩：《节制生育西风东渐》，文新传媒网（来源：新民晚报），2008年6月8日，

][丁莉芳，杨东铭：《试述桑格夫人的生育节制主义及对中国的影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02期。]

其实，在桑格夫人来华之前，中国已经有人开始提倡生育节制了。比如1921年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又在《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然而，他们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1922年12月，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不无伤感地指出:“我于三年前看见我国人猪狗似的繁育”，因此，大力“提倡生育限制法，大受社会的咒骂”，没想到桑格夫人来华宣传，“前时骂我的报纸竟一变而为欢迎桑格夫人的主张了。”为此，张竞生不禁感叹，“实则我的学理比桑格夫人的高深得多。但我被侮辱，伊享盛名，所以不同的缘故，因为伊是美国的女子，我是中国的男人！”[侯杰，王正：《计划生育要从他们说起》，人民网（来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07月23日，]

第三章 第五节、计划生育思潮西风东渐

张竞生其实并非自夸。他1912年至1915年就读巴黎大学，1916年至1919年在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留法的期间，法国生育率从1912年的2.49跳跃性下降到1916年的1.23；而当时美国的生育率还在3.0左右。法国节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比美国要先进。张竞生在法国猎艳甚多，亲身体验了法国各种性生活方式和节育方法。

张竞生1919年博士毕业，1920年初回国，没来得及体验法国的新人口政策：给生育8个或以上孩子的女性颁发“法国家庭荣誉勋章”；立法规定不仅堕胎是非法的，而且传播避孕方法也是非法的。法国生育率从1919年的1.59上升到1920年的2.69。[“TOTALFERTILITYRATE(TFR)ACCORDINGTOTHEMARITALSTATUS,”NationalInstituteofStatisticsandEconomicStudies–France,,2011/9/10.]

张竞生回国后就不遗余力地宣传节育，呼吁少生优生。他认为中国人4亿是极限，最好减少到3亿。他提议一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否则罚款。

其实1820年以来中国人口几乎停滞增长，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下降到1913年的，而同期西方国家人口占全球比例却从上升到。[AngusMaddison’swebsite:

7]192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是54岁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30岁左右，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仍然很高，即便如“猪狗似的繁育”，也只勉强维持人口不减少。如果中国人

也节育，那么人口必将锐减。孙中山就认识到中国新青年中马尔萨斯主义的盛行有让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在《三民主义》中说：

“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孙中山认为：人口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巨大力量；列强人口的日增，中国人口不增甚至减少，有亡国灭种的危害；中国只有增加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解决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才能避免这一危险。[王永恒：《论孙中山的人口思想》，人民网（来源：《人民论坛》），2009年08月25日，]

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也非常反感张竞生的观点，斥其为“神经病”。

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仍然非常落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孙中山等人那样的战略眼光，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病根在于人口过剩，所以只要有方法让人口数量减少，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桑格夫人的观点让大家发现了一种“得救”的方法，叫做“节育”。大家对于桑格夫人，也像招待活人济世的名医一般，非常恳切。[侯杰，王

正：《计划生育要从他们说起》，人民网（来源：《人民政协报》），2010年07月23日，]

离开北京后，桑格夫人又到南京、上海等地作节制生育的演讲，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桑格夫人的推动下，节制生育思潮在中国开始风起云涌。一时间，相关论文和著作呈井喷式涌现。许多人士如胡适、梁启超、马寅初等都写文章介绍评述了她的生育观。此后三四年中，桑格夫人的书以《生育节制法》、《节育主义》、《女子应有的知识》等书名被译成中文出版。[乔晓轩：《节制生育西风东渐》，文新传媒网（来源：新民晚报），2008年6月8日，

]

第三章 第六节、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针对艾奇逊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49年8月发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反驳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p1512。]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国土。"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年—1897年）的观点类似。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中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吃鸡越少，人越多吃则鸡越多。"因为人不但能吃鸡，也能养鸡。

解放初，中国是限制堕胎的。1950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汤兆云：《邓小平是最早一位支持群众进行节育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来源：《百年潮》），2009年04月03日，]

但当时城市婴幼儿死亡率已经下降，部分干部和城市居民由于工作和住房等现实压力，有强烈的避孕要求。而1952年在印度成立了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已经开始掀起。当时节育不但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中，而且在政治领袖中有相当大的共识。

1953年春，张竞生写下1.3万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中央机关收到后批示"退回、酌办"，把信退回广东省委，省委又把它退回张竞生所在单位。[陈冰：《张竞生：现代中国学术疆域的拓荒者》，《晶报》，2008年09月25日第A16版，]

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曾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但邓小平副总理于1953年8月要求卫生部改正，并敦促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新华网，]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说："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大负担。"

1954年11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54]卫药字第579号（1954年11月10日）。]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委员长在一次关于节制生育的会议上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刘少奇：《提倡节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华网（来源：《刘少奇选集》下卷），2004年12月24日，]

第三章 第六节、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

中央领导的表态给了邵力子（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知识分子勇气。邵力子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以及1954年9月17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两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吴跃农：《邵力子：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中国政协新闻网（来源：《文汇报》），2005年06月09日，]1954年12月19日，邵力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邵力子再次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建议，得到马寅初、竺可桢等人的支持。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两处讲到节制生育。

按照毛泽东时代党内关系的准则，梁中堂推测，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有了转变，然后才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表现。[梁中堂：《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12月30日，]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国共

产党新闻网，]梁中堂考证认为这是现在看到的毛泽东讲计划生育的最早资料。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顺便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并表扬了邵力子。马寅初按照大会安排的发言，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思想，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马寅初当时也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也对马寅初的观点非常认同和重视。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倒是谈不上"新"，并未达到严复的高度，而与张竞生1920年的观点非常类似，比如避孕、晚育；"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心中还是很犹豫的，反复修改自己2月27日的讲话，最后将计划生育的内容全部删除，而是强调："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然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第三章 第六节、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

]

毛泽东心中一直认为“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他并不反对节育。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认为“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认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但他仍然强调：“我是赞成节育的。”在同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少年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李琦：《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人口控制思想探析》，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应该说，马寅初是响应毛泽东而提出“新人口论”的，但马寅初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刘少奇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新华网，]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

而马寅初的前任蒋梦麟（代理及在任北大校长长达17年）可没有马寅初那么好的运气。他因为在台湾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1959年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游宇明：《蒋梦麟的“硬”与“软”》，《文史春秋》2010年第03期。]

1959年海峡两岸对人口问题的争论与1932年美国的一场争论非常相似：统计学家路易斯·都柏林（LouisI.Dublin，美国大都会生命保险公司第三任总裁）说：“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将人口成比例地减少一半，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会改善”，他以此来反对亨利·奥斯本的控制人口的理论。[HenryFairfieldOsborn,“Birthselectionversusbirthcontrol,”Sciencevol.76no.1965(26august1932),pp.173-179.]

第三章 第七节、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

1959-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停止增长。1959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公报》记者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

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历史的记录：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60年回望(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来源：中国人口报），2009年8月29日，]

但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观点，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1960年9月公开出版。

1962年1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发[62]698号（1962年12月18日）。]

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比例小，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政策缺乏刚性，1962年到1970年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仍高达6.1，1970年也还有5.81。

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快速增加到1960年的6.7亿、1970年的8.2亿；而人均GDP却增长非常缓慢。以1990年的国际元为基准，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1936年为596美元）仅仅增加到1970年的778美元；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超过1万美元，台湾地区为2537美元，非洲平均为1335美元。要知道，公元元年中国人均GDP也有450美元。[AngusMaddison，]也就是说，1970年中国大陆是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生活水平与两千年前的先祖们没有多大差别。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人口多是贫穷的原因。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20世纪60年代各地在计划生育上做了很多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避孕措施也进一步改善和普及；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中学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导致70年代初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1973年12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晚婚晚育）、稀（两胎间需要有间隔）、少（少生）"的生育政策，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刘长发：《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是毛泽东的错误吗？》，人民网（来源：《真理的追求》2000年10月11日），2002年6月13日，][曹前发：《建国后毛泽东人口思想述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网（出处：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当时的计划生育还基本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反对强制（“软制”成分是有的）。因为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强制计划生育的，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提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认识到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曹前发：《建国后毛泽东人口思想述论》，中央文献研究室网（出处：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1973年12月25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代表时就明确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计划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1974年9月19日，在接见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代表及女用长效口服避孕药科研总结会部分代表时，华国锋说：“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要有正确方针、政策，不能强迫命令。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1975年5月22日，华国锋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领导小组时谈话说：“要做好宣传工作，注意防止强迫命令。不要一说抓紧搞，就搞摊派指标，生了孩子不给报户口。……有的单位卡得很厉害，怀孕六、七个月还非叫流产不可。”[梁中堂：《华国锋曾反对制定法规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梁中堂网易博客，2011年3月16日，]可见当时对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暴风骤雨。也说明1975年虽然中央反对强制，但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使用强制手段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生育率也下降到3.2。

第三章 第八节、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1978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1978年农业大丰收，但人均GDP仍然只有979美元，与台湾（4717美元）等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人们极其希望很快改变落后的状态，为此，中央还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并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

随着全社会对文革指导思想和理论开始进行反思，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很自然地将“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列为中国贫穷的主因之一，归罪于毛泽东不控制人口。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副总理在1979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并在各种会议上不遗余力地鼓动。一些地方纷纷制定了“一胎制”的地方政策。[梁中堂：《“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112期，第64-73页。]

陈云很早就提出了通过计划生育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节制生育，现在粮食、布匹、学校都很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这些主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原因，没有被采纳。文革结束以后，又一次担任了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重提这个问题。在1979年6月给老部下陈慕华副总理的信中，他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建议采

取五条计划生育的措施：大造舆论；制定法令，只准生一个；加强避孕药物工作；优待独生子女；实行社会保险。[王建：《陈云经济发展观探析》，人民网（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5期），2005年05月30日，]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新华社紧急调研后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报告。6月21日，陈云副总理将该报告批转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贺吉元：《马寅初与毛泽东人口问题的一场论争》，人民网（来源：《中国档案报》），2002年6月13日]。胡耀邦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商量解决。1979年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领导到马家宣布为马老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选举马寅初先生为名誉会长。[穆光宗：《马寅初的人口论：毛泽东为什么会先赞同后反对？》，凤凰网（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29日，]

梁中堂考证认为：党和政府没有批判马寅初，除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辩论会以外，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于民主党派和学术界的一些报刊。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办的机关报刊则基本上没有参与和介入批判活动。马寅初1960年（78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以后，仍继续履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和职责，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在"文革"中马寅初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并与老上级陈云保持长期的友谊。"文

革”后的1977年，马寅初参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978年年初邓小平复出后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马寅初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并出现在全国政协大会的执行主席名单上。[梁中堂《马寅初事件始末》，共识网，2012年5月30日，]

第三章 第八节、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因此，马寅初本人其实没有“反”可“平”。1979年为马寅初“理论平反”、将其搬上神龛，其实是为了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舆论准备。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问题是毛泽东效仿苏联“英雄母亲”的政策鼓励生育。

其实所有国家在战后都出现人口增长（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但这只是一过性增长。中国人口并不会真的会如马寅初所预测那样50年后会超过26亿。并且当时根本谈不上鼓励生育。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在革命胜利后，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很苦，无产阶级生活更苦，小孩生多了没有办法。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后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才搞‘母亲英雄’，提倡生育；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口减少，又有大量荒地可以利用，增加人口

有利，就提倡生育了。为什么苏联先节制生育后提倡生育，因为情况变了。我们中国要不要搞‘母亲英雄’和提倡生育呢？我们不要搞，我看将来也不搞，可能永远不搞。我们在陕北时提过‘人畜两旺’的口号。据我所知，当时陕北婴儿死亡率很高，生下来的小孩有百分之五十都死了。人民要求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才提出‘人畜两旺’。我们并未提倡多生，主要是设法降低婴儿死亡率。又因为有人不赞成新法接生，所以要宣传。但就在那时，‘人畜两旺’在干部中也没有提倡。”[刘少奇：《提倡节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华网（来源：《刘少奇选集》下卷），2004年12月24日，]

可见，所谓效仿苏联搞“英雄母亲”政策，其实是指共产党在陕北的时期（死亡率极高）。将1950年后的人口增加归罪于毛泽东的“英雄母亲”政策，是张冠李戴。在1950年到1953年这4年时间，即便不赞成堕胎和节育，四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6.0，与其前几年一致，也与其后的几年（允许节育）一致；台湾地区在1951年到1960年平均生育率为6.3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都在6左右，中国、印度、泰国、巴西、越南、伊朗无不例外。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非洲国家的生育率也仍然在6。6.0左右的生育率接近现实生育极限（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即便鼓励生育也没有用，1950-1953年限制节育也只影响少数城市居民。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PopulationDivisionofthe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oftheUnitedNationsSecretaria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1950-1980年中国人口基本与世界同步增长，中国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增加

到1970年的8.1亿（是1950年的1.47倍）、1980年的9.8亿（是1950年的1.78倍），但占全球比例一直稳定在22%。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由1950年的11.6亿增加到1970年的18.56亿（是1950年的1.6倍）、1980年的23.7亿（是1950年的2.04倍），人口增长比中国还要快。台湾人口由1950年的756万增加到1970年的1475万（是1950年的1.95倍）、1980年的1787万（是1950年的2.36倍），[姜道章，《人口成長與國土資源》，《台北市教育週報》第十卷第二期。][台湾內政部社會司网站，]人口增速也比中国大陆快。

第三章 第八节、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中国人口增长主要是预期寿命的延长。根据联合国的资料，1950-1955年中国男、女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39.3岁、42.3岁，印度分别为39.4岁、38.0岁，世界平均分别为45.2岁47.9岁。[“WORLDPOPULATIONTO2300”,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

PrintedinUnitedNations,NewYork,2004,]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1》，1960年之后中国的寿命延长明显快于其他国家。

表1各国历年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1，”WorldBank,27September,2011update,]

年份	中国	印度	韩国	世界	高收入	中收入	低收入	拉美
1960	43.5	42.4	53	52.6	68.6	48.1	42.3	56.1
1965	51.3	45.8	56.8	55.8	69.7	52.3	44.6	58.2
1970	62.9	49.1	61.2	59.3	70.6	57.4	44.6	60.2
1975	65.7	52.6	64	61.4	72.2	59.8	46.5	62.3
1980	67.0	55.3	65.8	62.9	73.3	61.5	50.2	64.5
1985	68.3	57.0	68.5	64.2	74.5	63.1	51.7	66.5
1990	69.5	58.4	71.3	65.4	75.5	64.5	52.7	68.2
1995	70.4	59.8	73.4	66.2	76.3	65.4	53.4	70.0
2000	71.2	61.6	75.9	67.2	77.6	66.6	54.7	71.6

2005 72.2 63.4 78.4 68.3 78.7 67.7 56.7 72.9

2009 73.1 64.8 80.3 69.4 79.6 68.8 58.4 73.9

中国官方媒体也认为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81年的68岁，并认为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8年的6‰，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1981年的35‰。[唐钧：《人人享有：中国医疗保障的新蓝图》，新华网（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09月05日，]

可见，1949年后中国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死的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当时物质上是贫穷，但是在医疗、基础教育、农田水利建设、科技创新（如杂交水稻、航天技术）等方面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是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但一些经济制度确实是非常僵化的，比如笔者家乡（湘西雪峰山）由于海拔高（500-1200米），不适合种双季稻，但当时的领导要求我们公社与其他海拔低（一百多米）的公社一样种双季稻，结果早稻减产，晚稻颗粒无收，并且又不允许开垦荒地，笔者的童年是饥寒交迫；但赤脚医生制度却让笔者活下来了。如果没有当时的医疗制度，现在在世的人很多在婴幼儿期就已经夭亡。换句话说，当时虽然“活得不好”，但是却让大家“活下来”了。当时的政策是经得起“生命核算”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有几十年的滞后期

（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鼓励生育，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人均GDP直到二战后才快速增长），当时“活下来”的人口奠定了1980年后几十年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

但是有生也有死，等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老年，开始大规模死亡的时候，中国将出现一个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伴随的将是国力的衰退。

第三章 第八节、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马寅初提出的“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在当时是错误的（婴幼儿死亡率高，当时的“二胎”政策效果和后面的一胎化政策其实是一样的），在现在也是错误的（不孕率高，单身、丁克比例高，生育意愿低）。

下表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用年中人口数和出生率计算出生人数）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统计出版社，1999年]其实这个数据也不是很准确，因为相应年龄人口与1982年人口普查有出于。

表21957-1979年中国生育率、出生人数（万人）

年份	生育率	出生		年份	生育率	出生	
		实际	马寅初			实际	马寅初
1957	6.41	2169	677	1969	5.72	2715	949
1958	5.68	1909	672	1970	5.81	2736	942
1959	4.3	1650	768	1971	5.44	2578	948
1960	4.02	1392	692	1972	4.98	2566	1031
1961	3.29	1190	723	1973	4.54	2463	1085
1962	6.02	2464	819	1974	4.17	2235	1072
1963	7.5	2959	789	1975	3.57	2109	1181
1964	6.18	2733	885	1976	3.24	1853	1144

1965 6.08 2709 891 1977 2.84 1786 1258

1966 6.26 2578 824 1978 2.72 1745 1283

1967 5.31 2562 965 1979 2.75 1727 1256

1968 6.45 2756 855 合计 51584 21707

假如1957年就采纳马寅初理论，每个妇女只生两个（生育率为2.0）的话（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1957-1979年共出生2.1707亿人，比实际的5.1584亿人少生2.9877亿（51584-21707=29877万），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宣传一致。换句话说，依照马寅初理论，1957-1979年出生人口中有大约58%是不应该出生的。这少生的三亿人到2010年有两亿多孩子。将马寅初理论抬上神龛，意味着否定5亿多生命的生存合法性！

将1982年的人口普查的各年龄组人口以年龄别存活率回推1979年各年龄组人数。然后依照上表中的比例计算马寅初理论下1979年各年龄组人数。比如1957年依照马寅初的话只出生677万，是实际出生2169万的；1979年的22岁人口（1957年出生）实际为1895万，那么依照马寅初理论的话只有591万（1895=591）。

在1957-197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少生三亿后，分两种方案预测1979年后的人口：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停止计划生育。年龄别存活率和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参见第四章“假如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会有多少人？”。

1979年的时候，计划生育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政策惯性很强；中国人口总量还是美国的3倍，很容易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人口太多、计划生育力度不够”；而当时国际控制人口的思潮高涨，因此，中国很可能不但不停止计划生育，反而同样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1989年的生育率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实际生育率应该会更低，因为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统计出版社，1999年]1990-2000年的生育率采纳200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2005年的生育率采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2010年的生育率采纳“六普”的结果，中间缺失年份用线性穿插。1980-2010年的出生性别比采纳2010年人口普查的0-30岁的性别比。

第三章 第八节、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

假如1979年后中国停止计划生育，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1980-2010年的生育率应该略高于泰国。但是考虑到中国已经实行二十多年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已经改变，避孕率很难下降，凡是曾经实行过家庭计划/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率都没有回升到1.8以上的，因此中

国的实际生育率应该远比泰国要低。但是又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对1979年后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停止计划生育后，中国的实际生育率还是会有所反弹的，生育率应该会略低于泰国。这里乐观地假设1980-2010年的生育率与泰国一样。[“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2，”WorldBank,September28,2012update,]出生性别比为106。

表31980-2010年中国的生育率

年份	停计生	一胎化	年份	停计生	一胎化
1980	3.39	2.24	1996	1.82	1.36
1981	3.20	2.63	1997	1.79	1.31
1982	3.02	2.87	1998	1.76	1.31
1983	2.86	2.42	1999	1.73	1.23
1984	2.71	2.35	2000	1.71	1.22

1985	2.57	2.20	2001	1.70	1.24
1986	2.45	2.42	2002	1.68	1.27
1987	2.35	2.59	2003	1.67	1.29
1988	2.26	2.31	2004	1.66	1.31
1989	2.18	2.25	2005	1.65	1.33
1990	2.11	2.37	2006	1.64	1.30
1991	2.05	1.80	2007	1.63	1.27
1992	2.00	1.68	2008	1.61	1.24
1993	1.95	1.57	2009	1.60	1.21
1994	1.91	1.47	2010	1.60	1.18

1995 1.86 1.48

表42010年人口结构

独生子女政策 停止计划生育 人口普查

总人口（亿） 7.4 8.0 13.4

占世界比例（%） 11.7 12.6 19.4

15-59岁人口（亿） 4.6 4.9 9.4

60+岁比例（%） 22.5 20.7 13.3

65+岁比例（%） 15.2 13.9 8.9

中位年龄（岁） 38.2 35.1 34.9

老年抚养比（%） 21.6 20.7 12.0

总抚养比（%） 42.6 48.9 34.3

图1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图

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数（万人），从下往上依次是：0-5岁、5-9岁、10-14岁……。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人口有9.4亿，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只有，正是凭借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如此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目前能够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当初采纳马寅初理论，即便1979年后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10年总人口也只有8.0亿，

15-59岁人口只有4.9亿，而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却高达（美国只有，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那么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因为老年化而步履维艰。

第三章 第九节、1979年后中国开始实行

在社会发展和“晚、稀、少”政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的生育率继续下降到1978年的2.72、1980年的2.24。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一方面是“穷怕了”，一方面对未来人口增长没有底（当时人口增长仍然较快），对科技进步缺乏信心，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提高会自发降低生育率。因此，决策者和理论家、学者们仍坚持将控制人口当成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1979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费里克斯?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来源：《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979年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毕竟还缺乏相关的学术论证。而中国长期以来并无专门研究人口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刘铮、邬沧萍等人也是临时转行从事人口研究。

国际上，《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已经掀起了控制人口的强大舆论，对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冲击很大。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此后与中国历届领导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提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很难

相信他没有游说中国领导人实行计划生育。而从中美开始接触，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国内舆论对西方文化理论也由过去的绝对排斥，转为吸收、学习为主。这也成为中国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态度转化的重要背景。

1973年6月戴维·洛克菲勒访问中国，受到列毛泽东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谈了两小时。但是克菲勒拒绝透露谈话的具体内容。他说，“谈话是极其融洽的”，涉及“大量的问题”。[《戴维?洛克菲勒在香港谈中国之行》，《参考消息》1973年7月6日。]是否涉及到计划生育，不得而知。

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从1972年到1986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曾8次访华，“我国领导人多次亲切地同他会面，进行友好谈话。每次，他都非常关切中国人口政策和方案的制订与实施。”说明他早在1972年就访问了中国，那么甚至可能对中国1973年的计划生育都有推动作用。美国有电视节目称，老布什在1972年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1974-1975年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曾参与游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需要查找相关档案证据）。

《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给予最优先资助。显然，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国属于后者，于是中国就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优先资助国家。

1979年，中国开始获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多边援助。要知道中国1950年-1980年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中国历年外汇储备总表——1950-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就与中国草签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如此慷慨、如此急迫）。

第三章 第九节、1979年后中国开始实行

1978年6月12- 16日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七届世界大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来自45个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芬兰总统出席了开幕式。中国自动化学会派出以杨嘉墀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导弹专家宋健随杨嘉墀去芬兰参加此会，并顺访荷兰，荷兰的屯特大学的微分博弈理论专家奥尔斯德（GeertJanOlsder）向宋健等客人介绍了人口控制理论，并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的资料。宋健回国后与李广元、于景元等人开始了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了，宋健的学生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看到会议路标，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介绍了人口控制论。1979年12月7—13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梁中堂目睹了李广元“征服”包括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计生委的前身）在内的全体与会代表。与此同时，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些教师（王浣尘、王月娟、蒋正华、邵福庆等），也在用控制论的方法预测中国人口。[梁中堂：《“一胎化”政策形成的时代背景》，《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112期，第64-73页。]依照宋健自己后来的话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

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曾涛思:《坚守底线是一个人应有的情怀》，新浪网（来源《中国青年》），2005 年 04 月 28 日 ，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8/14266519984.shtml]

1979年，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中央要为马寅初老先生平反，为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落到1979年刚从教育部的行政岗位上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田雪原（北大校友）的头上，田雪原开始研究人口问题。

1980年2月13日，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一度曾有人主张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每隔5年开展一个“无婴年”等等（山东冠县1991年真实行过“百日无孩”运动）。[士心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由来》，中华读书报（摘自《新世纪》1998年第3期），1998年03月18日，]

当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对科学和人才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因为这是我国控制论最高权威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的“课题”结论，在中央及民众中影响都相当大。钱学森和经济学家

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根据宋健的优化方案，约在2070年左右，中国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09月02日,]王震副总理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

第三章 第九节、1979年后中国开始实行

据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北京晚报》对宋健在座谈会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并配发漫画。在这次会议上，宋健再次成为焦点，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参加《公开信》起草工作的，一共有8个人（栗秀真、梅行、宋健、刘铮、苏沛、刘庆山、王连城、张敏才）。初稿由宋健撰写，后由张敏才、王连城执笔，胡乔木、陈慕华等人又做修改，最后提交书记处讨论定稿。[《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始末》，新华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9期），2011年01月14日，]

198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徽标就是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1981年被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桑格女士所创立）接纳为准会员，1983年被批准为正式会员。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政策非常关注。根据《人民日报》1987年的报道，1980年9月，以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执行主任拉斐尔·萨拉斯为首的人口基金代表团访问中国，“同我国正式签订了人口基金第一期援华方案协议，规定在1980至1984年间，人口基金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援款，用于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产期保健、人口学研究与人员培训等22个项目。”[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萨拉斯一行时指出：“我们制定了控制人口的计划，争取到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这个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的经济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提高。”[《邓小平思想年谱?1980年》，人民网，]这说明，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一胎化”政策制订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

1980年9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文简称《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华网，]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优生优育”也成了国家的政策。

1985年11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说："有少数外国人骂我们的人口政策。他们真正用心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十五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

当时的情况是：领导提出"一胎化"的设想；学者以科学的形式为长官意向诠释；然后领导又迷信学者的"论证"。捏了个泥菩萨，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

第三章 第十节、计划生育后果始料不及

在《公开信》发出几天后，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光明日报》1980年10月3日。]

宋健开创的人口控制论学科的建立被称为“结束了从马尔萨斯以来长达200多年的激烈争论，把人口学变成一门精确的定量科学”。西方人口统计学的奠基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考尔教授（AnsleyJ.Coale，在诺特斯坦于1959年担任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会长之后，考尔继任为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所长）评价说：“宋的研究和我们西方的研究方法完全不同，那里要有很高的技巧”。[《宋健》，何梁何利基金网站，]1987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奖。[《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09月02日,]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的误差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宋健：《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被人口普查数据证明远远脱离实际。

《公开信》中曾经引述了社会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质疑：“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华网，]事实证明，当时许多对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偏于乐观了。

比如，《公开信》认为不会出现“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很快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失衡。今后将有四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

《公开信》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四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但事实上中国在上世纪末就进入了老年化社会，现在离公开信发表仅30多年，如何实现全社会的“老有所养”已成了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城市已普遍实现了社保，但仅有四千万老人得以享受。农村老人还远谈不上社保全覆盖，即使有一些，标准也不高。现在国家已经在考虑推迟退休年龄，今后高达四亿老人的养老将是未来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2012年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现在媒体和社会的舆论给老年人一种误导，就是养老的很多责任推给政府”，“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郭少峰：《全国老龄委副主任称养老责任不能全靠政府》新华网（来源：新京报），2012年08月25日，]

《公开信》认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但事实上中国在2003年就开始出现民工荒。

《公开信》认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迫使中国走外向型经济模式。

宋健认为生育率为2.3高于更替水平，人口会一直增加下去。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婴幼儿死亡率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也在107（略高于发达国家的105），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2左右（高于发达国家的2.1），2.3的生育率对中国来说只略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将不断下降（严复、毛泽东早就认识到这种规律）。人口在低惯性增长几十年后，就会停止增长，不可能在2050年达到宋健所说的40亿人。当时应该做的是废止“晚、稀、少”那样的宽松计划生育政策，然后在1990年之后防范生育率的过度下降。如果1980年就彻底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10年中国人口最多只能达到14.6亿，总人口在2032年达到顶峰后会负增长，到2100年降低到11.6亿人。

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在这方面我们抢了个第一，但这个第一是我们几代人都难以承受的。

第三章 第十一节、中国人口学的建立（

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成立了全国人口学会筹备组，许涤新、陈道、刘铮、刘庆山任正、副组长。根据1980年《人口研究》的资料：“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应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的邀请,派出刘铮、张乐群、田雪原、袁方、蒋琦等五同志，于5月19—23日去美国夏威夷出席了该所举办的‘中国人口分析会议’。”[《中国

人口学家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中国人口分析会议”》，《人口研究》1980年第02期。]

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选择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应该是段纪宪起的桥梁作用。

段纪宪是贵州人，抗战胜利后，就读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本应在1950年毕业，但因为抗拒让出宿舍给大陆撤退来台的教育部人员，1949年10月1日台大布告说：“学生段纪宪在校屡次滋事，应即开除学籍”。段纪宪被开除后，被推荐到农复会人口研究单位，后又再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深造，应该算是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华人人口学家。

1948年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派出专家（包括诺特斯坦）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菲律宾等地调研了三个月。[Yu-lingHuang,“ThePopulationCouncilandPopulationControlinPostwarEastAsia,”,DepartmentofSociolog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2009,]除了给日本制订控制人口的政策外，还建议中国、韩国等地控制人口。

农复会是美国援华法案的一部分，有两位美籍委员、三位中国籍委员，均由两国“总统”任命。美籍委员贝克（JohnEarlBaker）认为台湾必须控制人口，蒋梦麟主任（与桑格夫人保持长期的友谊）也一

直支持控制人口。段纪宪在农复会很受重视，1951年就出版了《台湾之人口》。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社会学部副主任埃文斯（RogersFEvans）推荐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者巴克利（GeorgeWBarclay）博士到台湾进行人口研究。段纪宪是巴克利在台湾的合作伙伴。巴克利对段纪宪评价很高，1953年的时候说段纪宪还要回普林斯顿。[赵育农：《一个女性经验的家庭计划：台湾家庭计划早期的发展（1954-1964）》，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第19-23页。]

1957年，段纪宪前往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当年便回到新中国，先被分配在农业科学院工作，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当英语教员，“文革”期间被扣上“台湾特务”、“美国特务”、“英国特务”等罪名，下放到团河农场劳动。段纪宪1973年离开了中国前往香港，后又在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推荐下到了夏威夷，成为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是由保罗?德曼创办于1969年，保罗?德曼在1973年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后，韩国人赵利济（Lee-JayCho）继任为所长（也是中西方中心的副主任）。赵利济对段纪宪非常倚重和信任。

1981年2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宣告成立，马寅初为名誉会长，许涤新为会长，陈道、刘庆山、刘铮、宋健为副会长。3月25日段纪宪访问中国，并表示将协助中国社科院创办英语培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0年大事记（1978～2008）》，人民网-教育频道，2008年09月25日，]段纪宪先后把众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安排到东西方中心进行交流或留学（如田雪原、马赢通、阎志强、杨宜勇等）。他与宋健、于景元合写的一部有关中国人口控制的英文专著

《PopulationControlinChina:TheoryandApplications》，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关注。赵利济评价道："这本书将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里程碑。书中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中国是重要的，而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人口增长已成为紧迫问题的第三世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宋健》，何梁何利基金网站，]于景元在1986年还获得东西方中心的一项大奖。可见美国东西方中心在创办中国人口学、培养中国人口学家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第三章 第十一节、中国人口学的建立（

除了东西方中心外，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等机构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学者（如顾宝昌、曾毅等人）。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归来的那批人口学家基本都是联合国基金资助留学的。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研究机构也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

笔者个人相信，这些人口学家（甚至段纪宪）是无辜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东西方中心的那些培训计划的真实目的。

1984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一期5000万美元援华项目结束后，又通过了第二周期5000万美元的援华方案。美国政府1986年拒绝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提供已答应的部分捐款。萨拉斯积极奔走于日本、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又筹集到2000万美元捐款，基本弥补了美国拒

付的款项。“上述两个人口基金援华方案对中国人口数据搜集和分析、计划生育、妇幼保健、避孕药器具生产、人口教育和宣传、人口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等都起了推动作用。”[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1979年以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共资助中国2.395亿美元。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的项目：[《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人口与发展合作的30年历程》，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网站：][《中国政府-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国别方案2011-2015》，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网站：]

第一周期(1980一1984）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二周期（1985一1989）援助金额为5000万美元。

第三周期（1990一1994）援助金额为5700万美元。

第四周期（1998一2002）援助金额为2000万美元。

第五周期（2003一2005）援助金额为1350万美元。

第六周期（2006一2010）援助金额为2700万美元。

第七周期（2011一2015）援助金额为2200万美元。

可以说，整个中国计划生育体系、人口学体系、人口数据体系都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中国计划生育的口号，如“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优生优育”，“少生快富”，“关爱女孩”，“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都可以从《NSSM-200》找到类似的原始依据。

目前活跃在中国人口学舞台的学者，基本上都具有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资助的背景。说中国人口学在学术上一直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所赞成观点的很大影响，应该是不为过的。

《NSSM-200》认为，为了避免被指责，必须将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包装成“可持续发展”。1983年联合国决议成立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一人”牛文元被选中为专家。1989年，以牛文元为首发布了第一份《中国生态环境预警报告》。1989年，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博士胡鞍钢出版《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强调了一胎化政策的必要性。1989年胡鞍钢和牛文元等人发表了第二份国情报告《生态赤字：未来时期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胡鞍钢、王毅、牛文元：《生态赤字：未来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分析》，1989年8月，载中国科学报编：《国情与决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他们的观点得到宋健的大力支持。[温志宏，刘梦羽：《采访牛文元：大

道至简》，中国网（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四期），2009年4月17日，]在宋健、牛文元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可持续发展"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作为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从1990年开始主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报告》。而支撑牛文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不正确放大中国人口增长和未来人口趋势为基础，然后以粮食、环境、气候等外部条件为"理由"控制人口增长。近年牛文元、胡鞍钢又提出要制定"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付毅飞：《牛文元委员："低碳发展"需要国家行动方案》，搜狐网（来源：科技日报），2011年03月09日，][《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核心理念能源产业承压最大》，人民网（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09月14日，]牛文元提出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这也是养活将到来的15亿人口的基本保障线"。[牛文元：《中国发展需设三保障线》，中金在线（来源：中国窗），2008年03月12日，,1277,3896061,]《学习时报》第220期发表采访他的文章：[陶春：《牛文元教授：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学习时报》第200期.]"牛文元认为，在新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六个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就是人口问题。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每年要消耗掉新增GDP的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13亿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讲话很可能是受牛文元的影响）。由于他的"研究"很符合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全球人口的理念，牛文元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第三章 第十一节、中国人口学的建立（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人口数据非常重视，1982年联合国派统计司主管人口和社会统计工作的副司长游允中（1935-2011年，台湾人，笔者与他有过多次邮件联系，就中国的生育率进行过辩论）指导中国进行人口普查（他也是中国后面几次人口普查的指导者）。1982年7月1日，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萨拉斯和助理执行主任萨迪克（1987年成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二届执行主任）访华亲自了解人口普查。7月1日下午赵紫阳总理在会见萨拉斯一行时说："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进行人口普查，不仅对中国是一件大事，对世界人口和发展也是一件大事。"赵紫阳在和萨拉斯讨论了未来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后说，中国一定要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以免对世界人口问题增加压力。[《赵紫阳会见萨拉斯时说中国一定要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科学网（来源：新华社，1982年7月2日），]

联合国人口基金还在国际社会上掩盖中国计划生育的真相。根据1987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萨拉斯博士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所开展的有关活动。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刘兆祥：《为世界人民事业献身的"人口先生"——悼念联合国副秘书长萨拉斯》，《人民日报》，1987年3月10日第6版。]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很多机构有合作项目，其办事处通常就在当地的计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强制性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却说，"虽然有人指责中国采用强迫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批准使用强迫的方法"。[UnitedNations,AbortionPolicies:AGlobalReview,NewYork:UnitedNations,

1992.Volume1,page85.]它声称："中国妇女可以自由、自愿地选择怀孕的时机和间隔；中国没有计划生育指标；堕胎不是促进中国计划生育的手段；中国计划生育不存在强迫。"1986年，萨拉斯说："对于计划生育自愿性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国的情况，我非常确信，中国自己会说，依照他们的文化标准，它们的方式不是强制性。也许依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个国家必须依照自己的标准。"[BrianClowes,KissingerReport2004:ARetrospectiveonNSSM-200,HumanLifeInternationa,2004,]

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执行主任萨迪克在CBSNightwatch电视节目中说，"联合国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堕胎，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强迫"。她坚持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完全自愿的"。["ForcedAbortion,InfanticideReportedinTibet,"TheWanderer,April6,1989,page2.]1991年4月11日萨迪克对新华社说："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其过去10年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和高兴。现在中国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派技术专家帮助其他国家。"[BrianClowes,Chapter4:China'sForcedAbortionProgram,TheFactsofLife,]联合国还授予中国"联合国最佳人口控制奖"。[StevenW.Mosher,"ThinkingClear:ForcedAbortionsandInfanticideinCommunistChina,"HumanLifeReview,Summer1985,pages7to34.Page33,footnote9.]

第三章 第十一节、中国人口学的建立（

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在参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外，也为中国的人口政策进行辩护，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其1997年的《世界儿童状况》中授予中国“世界最佳儿童友好国家”。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遭到强烈的抵制。1984年人口政策松小口后，生育率停止下降（但也没有回升），引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等人的不满和国际控制人口的组织的高度关注，“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国家科委组织了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人口控制与对策》课题组（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于”学派），得出结论：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政策。[《为啥只生一个好：用数学模型确定妇女生育率》，人民网（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09月02日,]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承认：随着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人们会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自然反应”。[PaulGeorgeDemeny,“PopulationPolicy:AConciseSummary,”PopulationCouncil,Volume173ofWorkingpapers,2003,]

中国在1990年之后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只有1.33。如果公众和决策层知道这些信息，也会有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自然反应”。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将生育率篡改为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却将联合国的数据当成圣旨，比如2006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

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人口计生委张维庆谈“稳定低生育水平，以人为本全面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中国政府网，2006年3月21日，]联合国、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用“修正”后的生育率数据，夸张地预测未来人口，淡化民众的这种“自然反应”。即便是开明派人口学者，也是尽量将民众的“自然反应”淡化为各种二胎过渡方案。并且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不争论”，使得大家不敢有“自然反应”；即便有，也无从表达。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媒体还不敢大胆提“停止计划生育”，而只敢说放开二胎。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14.5亿，与联合国2003年前的预测完全一致。[张维庆：《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年第12期。]

中国人口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将有非常好的前景。但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人口学家和“持续发展”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人口变成了问题，并且是大问题。他们是联合“谋杀”了鲜活的中华文明！

基辛格显然比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人士更清楚中国的人口危机。2011年1月20日他接受了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今后经济不可能赶上美国。[CharlieRose，“CharlieRoseTalkstoHenryKissinger.BloombergBusinessweek”，Bloomberg，January20,2011，]

中国人口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在“术”的方面毕竟还是积累了一些方法学知识（代价也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点需要高度肯定。但

是人口学缺乏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战略的准确比战术的精确更为重要。比如梁中堂教授某些战术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邬沧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战略上他却站得更高，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二胎方案虽然也是妥协方案，但是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梁中堂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积极上书让中央采纳他的观点试点，其道德和政治勇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一些人口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自发地脱离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当初的“学术轨道”，近年开始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努力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要体谅他们是站在“负起点”而不是“零起点”）。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口学者（比如李建新、穆光宗、陈友华、王广州等人）头脑中的“条条框框”比上一辈要少得多。

第三章 第十二节、美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如果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完全归罪于西方国家也不公平，因为中国本土提出控制人口的大有人在。我们只能说20世纪70年代，国际和国内控制人口的思潮合流了。

笔者相信美国控制全球人口是出于“利己也利人”的动机（当然美国利益优先）。连洛克菲勒三世本人可能动机也并不坏（他还是有名的慈善家，可能或多或少真的认同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作为一个富人，如果让他过上发展中国家那种穷日子，可能他会觉

得“没有生存的必要”。美国很多民众（尤其是富人）有类似的想法。他们高高在上地认为穷人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不懂得自发控制人口，需要他们去帮助。

二战后美国出现“婴儿潮”，生育率在1957年达到3.71的顶峰，人口增长很快。而当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本土控制人口的思潮非常高涨，这应该属于一种“自然反应”（当时中国的马寅初等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反应），不可苛责。《人口爆炸》作者保罗.埃利希不但希望将世界人口从当时的30多亿减少到5亿，也希望将美国人口从2亿减少到1.35亿。[RichardAPosner,PublicIntellectuals:AStudyofDeclin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2,]只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而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成本（物质成本和政治成本）更低，因此更加热衷于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避孕“不是正当的政治或政府活动、职能或责任”。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推翻了早先的禁令，使避孕行为合法化。1968年美国约翰逊总统曾经任命过一个关于“人口与家庭计划”的机构，研究推广计划生育的问题。1970年国会通过了《公共保健服务法》的第十章（TitleX），给青少年和贫困家庭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以及一些生殖健康服务。[易富贤：《家庭计划也是错误的》，光明网-光明观察，2009年12月21日，]

1969年8月，美国德州的女服务员NormaMcCorvey，声称遭到強暴怀孕，她找不到一个愿意为她进行非法堕胎的人。女权主义者鼓

励她向反堕胎法发起攻击，这就是著名的“罗诉韦德案”。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中，将堕胎合法化。这一判决影响之大，甚至被人称之为“第二次内战”。美国堕胎数由1969年的2.7万例增加到1975年的103万例。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急剧下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国会曾经想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但以失败而告终，于是1976年通过另外一项法律，禁止将联邦医疗补助方案用于堕胎服务。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社会全面趋向保守。影响美国人口政策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朱利安·西蒙等人的经济、人口、资源理论。美国政府认识到人口是资源而不是负担。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

给TitleX法案的拨款也逐年下降，裁减大量的机构和人员，如果保持在1980年的资助水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话，那么2007年应该获得$亿美元的拨款，但是事实上2007年给TitleX的拨款只有$2.83亿美元。并且TitleX项目中用于家庭计划的比例从1980年的44%降低到2006年的12%，而与此同时用于Medicaid（医疗补助）的比例却从20%上升到70%。也就是说，作为“家庭计划”的专门法案，现在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第三章 第十二节、美国人口政策的演变

“罗诉韦德案”的当事人NormaMcCorvey虽然在1973年赢了官司，不过却生下了孩子。最初几年，她是全美知名的女权斗士，进入堕胎诊所工作，她渐渐发现了堕胎对于婴儿的不人道，后面成为“反堕胎斗士”。

美国共和党也一直试图推翻“罗诉韦德案”。美国国会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次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然而都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否决。[JulieRovner,“’Partial-BirthAbortion:'SeparatingFactfromSpin,”NPR,

February21,2006,]2003年国会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禁止后期堕胎的法案（Partial-BirthAbortionBanAct）。小布什总统随后他签署了这一法案，称这个法案“结束了恶行，重塑了美国的生活文化”。该法案获得了70%的民众支持。“美国民权联盟”的TalcottCamp指出,该法案连怀孕头12周到13周所采取的堕胎手术都要加以禁止。

2012年8月美国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竞选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通过一项取缔堕胎的宪法修正案，赋予未出生胎儿不可剥夺的生命权。[MattRourke,“APsources:GOPplatformdraftkeepsamendmenttoendabortionswithnostatedexceptions,”washingtonpost,August21,2012,]

从某种角度讲，1973年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和1974年《NSSM-200》是姊妹关系，前者反映内政，后面反映外交。

由于“罗诉韦德案”是“内政”，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并且是“公开”的，美国民众有机会进行反思，从而纠正相关的一些错误政策。而《NSSM-200》是“外交”，无关民众的利益，并且是“绝密”的，民众无从反思，错误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并且中国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在国际上宣传说中国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使得美国很多普通民众不知道真相。

美国很多决策的制订并没有经过公众同意，而是由少数几个“权力比总统还要大”的人士（如基辛格）决定的。很多决策不但公众不知道，连总统也不一定知情。如果1974年将《NSSM-200》进行投票的话，不但在全民投票中通不过，连在议会也通不过。而联合国人口基金、美国控制人口的一些组织和个人作为利益集团，必然本能地为自身的利益不惜手段，包括夸大世界人口危机。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西方国家内部有很多人是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者毛斯迪（StevenW.Mosher）1979年在中国调研，回美国后递交报告反对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但是被斯坦福大学取消博士学位；他后面成立人口研究所，并以身作则，共生育了9个孩子。[StevenW.Mosher,PopulationResearchInstitute,] 美国众议员史密斯（ChrisSmith）在20世纪80年代就坚决反对中国计划生育，并与毛斯迪等人一起谴责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中国计划生育。2011年8月2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说时称“完全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拜登的此番讲话遭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强烈抗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批评拜登：“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可怕而野蛮的，副总统对这一政

策的默许将对美国民众的道德底线产生震撼。”[JenniferRubin,“RomneyslamsBidenon‘onechild’commentinChina”,TheWashingtonPost,August23,2011,]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瑞安认为拜登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的观点“非常极端。”[“TranscriptAndAudio:VicePresidentialDebate,”NPR,October11,2012,]他们反对计划生育，当然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宗教的，政治的。本文所引用并公布的很多美国政府对于人口控制的内部资料，也得益于美国国内有不同的声音，是美国学者首先整理出来并发表的。正是因为美国内部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控制全球人口，因此基辛格、洛克菲勒基金、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东西方中心等采取了秘密方法，避免让公众知道。如果美国公众知道真相，笔者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反对中国计划生育的。

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在对控制全球人口问题上出现分裂并导致政策摇摆。比如美国政府曾于1986-1992年（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期间）、2002-2008年（小布什总统期间）中断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NSSM-200》也是在老布什时代被解密的。而克林顿、奥巴马时代又恢复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支持，其实克林顿、奥巴马比老布什更加清白，他们对当初出台《NSSM-200》的一些背景并不了解（就像现在中国领导人不了解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背景一样），可能只是被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内某些团体所忽悠，轻信了控制人口的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没有深究其严重后果。比如他们相信控制人口有助于保护妇女权益，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提高妇女教育水平、降低妇女和儿童死亡率（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控制人口最大的受害者是妇女，因为生育率过快地下降必然导致老年化和社保危机，而妇女比男人长寿几岁。少子化也提高了乳腺癌和子宫疾病的发病率。

国际思潮的多样化本来是很正常，尤其是在人口问题上自古争论就很大。经过各方面博弈，国家政策总体还是比较理性的；由于有纠偏机制，即便走入歧途也会很快纠正过来。比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在优生方面一些错误思潮在二战的时候就被纠正；70年代控制人口的错误也在80年代被纠正。印度在1977年也很快纠正了1976年在人口控制上的极端做法。

中国学术和制度的单一性使得中国对国际思潮缺乏综合辨别能力，政策很容易根据某些人的偏好一面倒地受多样化的国际思潮中的某一种思潮所影响。宋健等少数几个学者的短时间形成的错误观点很快就转变为国家政策，损害了所有人的根本利益。

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是害人害己。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减少给美国的经济机遇。中国今后人口老化和萎缩必将给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严重程度将远超过目前日本和欧洲人口老化给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后果。中国的人口与美国人口一样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停止计划生育不但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